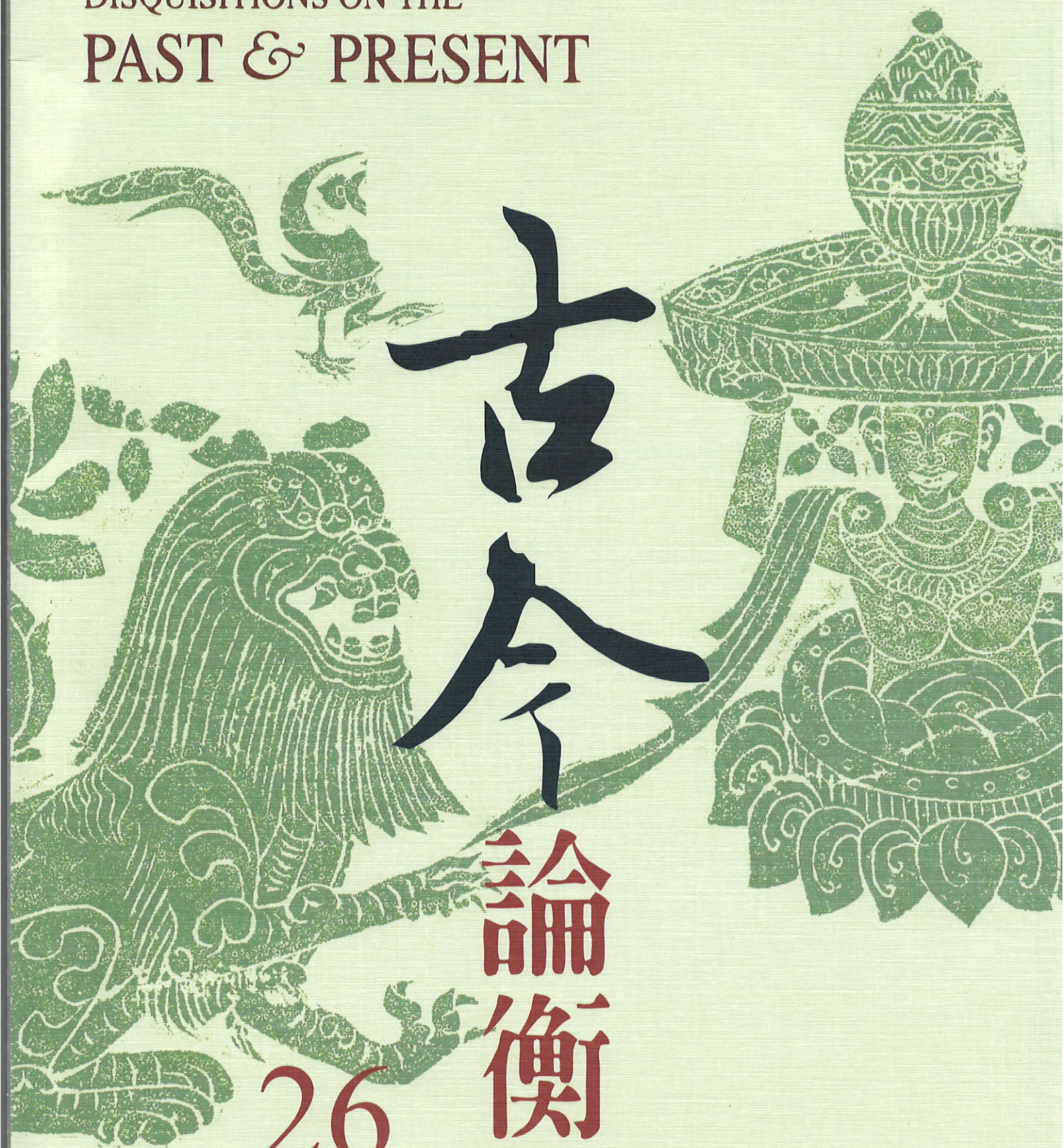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26



目錄

研究專論

- | | | |
|----|---------|---------------------------------|
| 3 | 王金潮 王 瑋 | 實驗考古——中國青銅時代透空青銅器泥範鑄造工藝求實 |
| 35 | 曹德啓 | 典範的複製與挪用——初探北周「文王碑」與唐叱干公三教道場之融攝 |
| 75 | 洪金富 | 校定本《元典章》序 |

研究討論

- | | | |
|-----|---------------------|---------------------------|
| 115 | 邁克爾·維茨爾
張 遠 (翻譯) | 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學——以印度學為重心的回顧 |
| 151 | | 編後語 |

十九、二十世紀的西方文獻學——

以印度學爲重心的回顧



邁克爾·維茨爾 (Prof. Michael Witzel) 著

張 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 翻譯

古今論衡 第 26 期 2014.6

§ I. 校勘 (textual criticism) ① 和寫本系譜研究 (stemmatic approach)

希臘傳統的文獻研究方法濫觴於西元前二、三世紀的亞歷山卓 (Alexandria) 和帕加馬 (Pergamon)。^② 亞歷山大學派認為，學者應該有能力判斷一個文本是否正確；與之相對，帕加馬學派認為，作者文本的原貌不可能恢復，因而學者應該在眾多現存寫本中選擇「最好的版本」。文藝復興過後許久，校勘學才得到了復興。始作俑者是 R·本特利 (Richard Bentley, 1662-1743)，F·A·沃爾夫^③ (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G·維科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還有著名的 K·拉赫曼 (Karl Lachmann, 1793-1851)。

文獻學即文本的批判研究，或許可定義為：^④ 立基在書本與口述文獻上的文明研究，以及理解這些文獻所需的所有周邊學科的研究。文獻學所需的工具 (Hilfswissenschaften, Assisting-Sciences)，包括考古學、書寫系統、天文學、動物學等等學科。於是，我們的工作不得不穿梭於「文本內外」。^⑤ 我不打算論議^⑥ 目前流行的對文獻學「批判 (critical)」的取徑。^⑦

* 本篇作者邁克爾·維茨爾教授 (Prof. Michael Witzel)，美國哈佛大學南亞系威爾士梵文教授，譯者張遠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南亞系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

- ① 譯者注：textual criticism，字面意思是文本批評、文本批判。作為一個學科，通行的譯法為校勘學，校勘學。此處譯為「文本精校」；與 critical edition (精校本) 相呼應。
- ② 見 Greetham (1994) 第八章。
- ③ 此人就已強調將現存寫本分類並歸入系譜。
- ④ 一九八八年哈佛大學舉行的題為「何為文獻學」的學術會議中說：「文獻學是基於文本的文化學 (Kulturwissenschaft)」。
- ⑤ 見 Witzel, *Introduction to: Inside the Texts - Beyond the Texts*. Cambridge: HOS-Opera Minora 2, 1997.
- ⑥ 見 E. Said 的詳細評論以及 Berry 撰寫的十九世紀英國東方學家們的抗辯，見網址：
<http://www.asiaticsociety.org.bd/journals/vols%2052/ORIENTALISM%20AND%20THE%20ASIATIC%20SOCIETY%20OF%20BENGAL.html>。
- ⑦ 見 Grünendahl 2009-2010; Robert E. Frykenberg 說：「理論，因其否認經驗主義證據，又因其蔑視歷史讀解中真正發生的事件，而成為以當下時尚為名的獨斷教條之偽裝。」(見 Berry, *loc. cit.*)；其他觀點，參見文獻學作為「殖民統治的文化技術」(Dirks 1996)，或是如傅柯 (Foucault) 有關權力的格言：「揭示權力和知識之間的共謀情形」(Smart 1997: 26)，或是作為「想像共同體」的單純表現 (Anderson 1983)，或是，這一說辭糟糕卻不乏趣味：「文獻學是關於家族的一種中產階級、家長制度、衛生學者 (式) 的思維體系；鍾愛親子關係，追蹤通姦者，並且懼怕雜交 (contamination，即後文所說的羈入現象)；雖然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 (異文是變異行為的一種表現)，卻是實證方法論的根基。」(Cerquiani 1999: 49)。這些評論忽視了對於「血統」、「族譜」的研究，甚至更為技術性的，對於遺傳基因系譜圖表 (cladistic phylograms) 的研究。這些研究在生物學 (古生物學，達爾文進化論)、最近的 (人類) 基因遺傳學、歷史語言學以及寫本的關聯研究中是常見而合理的學術實踐。最近，DNA 研究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外成基因現象 (epigenetic phenomena)，正好可以類比寫本中的「羈入現象」(見下文)。

§ I.I.

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們發現他們手中的寫本往往只是粗製濫造的副本。這很大程度上源自西元九世紀寫本書寫形式 (script type) ⑧ 的改變。(西元三〇〇年前後和一〇〇〇年前後，印度寫本發生了與之相似的重要變革；這至今才為人所知。) 因此，他們常常依賴於最古老的並且「更優秀」或是「更可靠」的寫本，然而更多是依賴於自己的學識，來「校正」這些寫本及其印本。這個校勘態度直到十九世紀早期寫本系譜研究方法確立 ⑨ 並且被拉赫曼大大發展 ⑩ 之後才有所改觀。拉赫曼引入了檢視 (recensio) 原則，⑪ 即在研究同一文本的不同接收寫本 ⑫ 的時候，一部分寫本中共同的錯誤構造出一個「系譜」(family tree, stemma)，隨後產生文獻的版本。⑬ 他清晰地界定了檢視 (recensio) 和勘誤 (emendatio) 的區別，即文獻的形態既取決於文獻的衆多來源，也取決於其後校勘者的修改。⑭

衆所周知，寫本系譜研究方法要求對於一部特定文獻的諸多現存寫本進行比較研究從而建立它們的族譜：某些後期寫本，在長期的傳播中屢經傳抄，因而在確立文本的層面上不具有價值 (eliminatio codicum descriptorum, the elimination of the manuscripts that have been re-copied)。⑮ 現存的相對古老的寫本可以分解成緊密相連的多個系譜。通常情況下，那個最為古老的寫本，祖本或者說原本 (archetype)，已經不復存在——這是生物學家所謂的「瓶頸」現象 ⑯——因此，我們不得不重建這個祖本。這個被重

⑧ 譯者注：即書寫時使用的字母體系。「字母體系」與「字體」略有不同。「字體」可能被誤解為同一字母體系的變體，如中文中的宋體、仿宋、黑體等；而「字母體系」則包含了全然不同的字母構成，如婆羅謎字體、早期城體、天城體等。

⑨ 見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959: 47ff., Housman 1921. Housman 仍舊不得不抱怨這些陳舊的觀點。

⑩ 拉赫曼很大程度上遺忘了他的前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 Politian (15th cent.)、August Zumpt (1815-1877) 及其他。見 Timpanaro 1971: 44ff., Schmidt 1988: 228, Gründahl 2009-2010, n. 54. 最早出版的寫本系譜是 Collin 和 Schlyter 的《維斯特哥塔拉根》(Vaestgoetalagen 1827)。拉赫曼在他的 *Habilitationsschrift über die ursprüngliche Gestalt des Gedichts von der Nibelungen Noth* (1816) 中確立了文本精校的規則。

⑪ 見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959: 59。關於羈入現象 (contamination) 的評論，見 Hanneder 2009-2010: 7。

⑫ 雖然拉赫曼並沒有使用可以獲得的全部寫本，而只是選擇了幾個重要（「優秀」）的寫本，並且極大程度上忽略了被篡改的寫本 (cf. Schmidt 1988: 231, 233)，他的方法依然被他的眾多追隨者們照搬。

⑬ 在拉赫曼校勘的 Lucretius (1850) 中，他證明三個主要寫本可以追溯到一個原本寫本。這個原本寫本共 302 頁，每頁 26 行，用草寫小字 (minuscule) 抄寫而成，抄自西元四、五世紀間一個用粗獷的大寫字母 (rustic capitals) 寫成的本子。

⑭ 拉赫曼的重要發現之一是《新約全書》的創作順序：Mark > Mathew > Luke > John，參見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959: 59；關於希伯來聖經中《摩西五經》(Pentateuch) 的四位著名作者，參見 Olivelle (2005: 379)。

⑮ 關於拉赫曼對羈入寫本的嚴厲淘汰，見 Schmidt 1988, Hanneder 2009-2010: 14 and *ditto*, Christina Pecchia in: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121-159.

⑯ 譯者注：「瓶頸」比喻研究進行到一定階段難以再向前推進的困境。在生物學領域，人類始祖的數量因特定事件而減少（如冰河世紀、疾病等）；從這些數目有限的祖先誕生了之後的人類社會。這些祖先的基因已很難重構。同樣，在寫本系譜研究中，系譜上溯到某個古老寫本就很難再往前追溯，「祖本」永遠不可獲得。

建的「祖本」可能會接近作者的年代，不過最通常的狀況是已經隔有一段時間了。而這是目前我們能夠獲得的最大成果。

問題是，這一原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應用於其他領域。雕版印刷術在東亞的出現明顯影響到了當地的傳統，並且與在歐洲或是印度出現的傳抄寫本產生的影響截然不同。¹⁷然而，在某些領域，最近發現的新史料戲劇化地改變了文獻傳統的視野。

在埃及出土了大量記載在莎草紙¹⁸上的古典希臘語（Classical Greek）和希臘化時代的希臘語（Hellenistic Greek）文獻，¹⁹內容無所不包，從買賣記錄、巫術²⁰、音樂²¹、薩福（Sappho）的詩或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戲劇，直到赫西奧德（Hesiod）²²或是荷馬（Homer）。²³這些出土文獻使得學者們可以重新審視近二百年的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如下所論，我們可以獲得的希臘和拉丁文獻的寫本往往數量有限，並且可以追溯到一個具有（早期）中世紀原本的兩條支脈的傳統。諸多新的發現允許我們建立一個不同的並且常常是獨立的傳統，這個傳統或許與重構的原本相一致，或許與之相違背。它們為日後的精校本提供新的史料，從而使新出的精校本更加接近原本，或甚至是更加貼近作者的原本。²⁴

新寫本的發現對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同樣非常重要。在巴勒斯坦的谷木蘭（Qumran）²⁵意外發現的二〇〇〇年前早期猶太教艾賽尼派（Essene）——或許還是薩都該教派（Sadducee）——的古寫本，記載了希伯來《聖經》中的具體內容。希伯來《聖經》中的許多章節都包含在這些「死海卷軸（Dead Sea Scrolls）」之中。因此，它們是現存最古老的希伯來語和亞拉姆語的聖經文獻，²⁶時間上溯至西元前二世紀。值得注意的還有，谷木蘭寫本中的部分內容，例如《出埃及記》（*Exodus*），《撒母耳

¹⁷ 其他早期文獻學成果：本居宣長（Motowori Norinaga, 1730-1801）獨創了一種與西方文獻學頗為類似的文獻學，來處理古日語文獻《古事記》（*Kojiki* 712 CE）和《日本書紀》（*Nihon Shoki* 720 CE）中的詩歌。在他之前是賀茂真淵（Kamo no Mabuchi, 1697-1769），研究比較晚期的《萬葉集》（*Manyōshū*）詩歌。在禁止儒家思想的江戶幕府時期，本居宣長借助文獻學研究支持京都皇室在宗教上的重要地位，用以對抗江戶幕府將軍，乃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¹⁸ 見網址：<http://www.lib.umich.edu/papyrus-collection/papyrology-related-links>。

¹⁹ 參見收集這類材料並即時更新的 Greek Thesaurus（網址：<http://www.tlg.uci.edu/>）。還可參見牛津的很多新材料（Oxyrhynchus collection，網址：<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oxfordshire-14289685>）。

²⁰ 見 Hans Dieter Betz (ed.), *The Greek Magical Papyri in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²¹ 見網址：<http://classics.uc.edu/music/yale/index.html>，包括希臘樂譜。

²² 見網址：<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literatureGreek.html>，MS 5094。

²³ 見網址：<http://homeriapapyri.appspot.com/CTS?request=GetCapabilities&withXSLT=chs-gc&inv=inventory.xml>。雖然，例如 Hawara 莎草紙等等，往往伴隨有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n）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制定的標準文本。

²⁴ 以荷馬的作品為例，中世希臘語時期的亞歷山大學者們（Hellenic Alexandrian scholars）建立的經院版本很難超越，然而也確實存在支離破碎的寫本從亞歷山大傳統中偏離，例如西元前三世紀的寫本 MS 5094（見網址：<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literatureGreek.html>）。

²⁵ 現在已經有網路電子版，參見網址：<http://dss.collections.imj.org.il/>。

²⁶ 在這項發現之前，我們有西元十世紀的馬所拉抄本。

記》(Samuel)和《以賽亞書》(Isaiah)，與馬所拉抄本(Masoretic)，希臘譯本(Septuagint)，以及撒瑪利亞五經(Samaritan Pentateuch)的版本大不相同，因此也不同於西元一〇〇年的希伯來摩西五經(Torah, Old Testament)聖典。

同時，卷軸還包含了大量宗教背景史料，甚至還有聖經原文考據傳統的史料——早期基督教文獻(希臘語)就是從中發展而來。

同樣，最近在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地區發現的二〇〇〇年前²⁷的佛教寫本也帶來了對早期佛典和相關文獻的重新評價。雖然這些樺樹皮上的寫本²⁸大多使用的是犍陀羅語(Gāndhārī)。犍陀羅語一度是南亞次大陸的西北方言。這些寫本在與其他早期佛教文獻的對比研究中具有非凡的重要性，這些早期佛教文獻包括巴利語佛典，早期佛教混合梵語佛典，²⁹以及日後的漢譯佛典和藏譯佛典，等等。一旦這些新發現的寫本校勘完畢，³⁰對於(後期)佛典的全面而重要的對比研究將指日可待，從而，即使我們不能完全重現³¹佛陀的原話，也可以接近佛陀涅槃之後原始佛教時期的口述傳統。

對於早期藏文史料而言，情況也十分類似。在藏文史料中，除去敦煌出土的零散寫本之外，³²人們主要依賴中世紀雕版印製的《丹珠爾》(Tanjur)和《甘珠爾》(Kanjur)。同樣地，這些新發現的寫本改變了我們對於古藏語和古藏語文獻的看法。

就漢語文獻而言，古墓考古新出土了大量簡牘，例如著名的戰國時期郭店楚簡，為校勘古代漢語文獻——如《禮記》，提供了實證基礎。因為這些竹簡寫本比漢代的校本還要早數百年。

因為，跟其他上述傳統一樣，現存的古代漢語文獻版本，是基於經久確立的學術傳統和中世紀印刷版本。而這些，正是其後學者研究的唯一依據。現在，不同的版本突然出現在竹簡上。正如希臘、希伯來和佛教文獻的案例，這種情況應當帶來對於因

²⁷ 關於用碳測定年代，見 H. Falk, Another collection of K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from Gandhāra. XVth Congress of the Intl. Assoc. of Buddh. Studies, Atlanta: an Avadāna MS, carbon (C14) dated to 184-46 BCE ; 同時參見 Allon, M. & R. Salomon, "New Evidence for Mahāyāna in Early Gandhāra," *Eastern Buddhist* 41(2010): 1-22。關於碳測西元前二〇六年到西元五九年佛經寫本，見 2010: 10-11, n. 39。

²⁸ 他們在藏於不列顛圖書館的犍陀羅卷軸裡，參見網址：<http://ebmp.org/>；斯奎因收藏(Schoyen Collection)，見網址：<http://www.schoyencollection.com/buddhism.html>；二十世紀初發現的犍陀羅語《法句經》(Gāndhārī Dharmapada)，參見網址：<http://titus.uni-frankfurt.de/texte/etcs/ind/mind/gandhpkt/dhpgpkt/dhpgp.htm>。見 Sarma 1985。

²⁹ 例如《比丘尼律》(Bhiksuni-vinaya), ed. by G. Roth: 2005。

³⁰ 正如慕尼黑的新一學院專案計畫的那樣，參見網址：

http://www.badw.de/aktuell/pressemitteilungen/archiv/2011/PM_2011_29/index.html。

³¹ 由於文獻的傳播歷史，從東部俗語，到西部的文學語言——巴利語，進而再到其他的俗語，例如犍陀羅語(Gāndhārī)，等等。

³² 見國際敦煌寫本項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參見網址：<http://idp.bl.uk/>。

襲而來的傳統文獻形態的質疑。將一部特定文獻的多個中世紀版本與新近發現的寫本進行對比研究，可能無法獲得原本，不過至少可以最終確立寫本/印本傳統的系譜（stemma），進而重新校訂多部重要古典文獻。³³ 這裡引用一個很新的例子：北京清華大學的劉國忠教授指出，依據清華簡，當前版本的《尚書》包含一些不可能是孔子編纂的段落。³⁴

§ 1.2.

文本精校不是從文獻中直接尋章摘句。這一做法最好延遲³⁵到確立合適的措辭為止，也就是說，在寫本的文獻傳統可以容許的範圍之內。³⁶ A·E·豪斯曼（Alfred Edward Housman）（1961：145）指出，同樣的謹慎態度可用於對待古典語法和詩律的規則，顯然也可以放在印度文獻方面，例如史詩、往世書、密續和眾多當地文獻——這些文獻充斥著「非語法」，即「非波你尼」的形式。³⁷

在檢視（recensio）和勘誤（emendatio）之後，則是更高級的校勘方法。基於我們對於語法、文體、平行段落或是平行表達等等的理解，以及對於作者觀點的把握——重複運用亞歷山卓模式（Alexandrian model）——我們可以詳細考察原本，並且嘗試對文本進行特定的更正。最後，我們可以探討文本中的一部分是否可以被添加，或是更加謹慎地，刪減。所有這些決定必須被置於現存全部資料中徹底考察（還包括那些相關文獻）。一位文獻學家越是如豪斯曼一般「運用他的頭腦」，那麼他便更能運用各種（現在還包括電子的）手段，那麼文本就會愈臻完善。

因此，同拉赫曼一樣，一位嚴謹的校勘者不會僅憑他或她的「天賦」就解決所有殘缺的段落。即使對於那些最為經驗豐富和具有天分的學者們而言，某些段落依然會保持晦澀難解。因此，為了日後讀者的裨益，最好的辦法是留下文中那些不尋常的難於理解的部分（lectio difficilior, 見 § 3.3.）——後來者很可能最終解決這些難題。

³³ 如果必要，由於某些極大的偏差，重校必須對照舊印本和「新」版本，平行進行。

³⁴ 見網頁：<http://www.scmp.com/portal/site/SCMP/menuitem.2af62ecb329d3d7733492d9253a0a0/?vgnextoid=a0359026449a4310VgnVCM100000360a0a0aRCRD&ss=China&s=News>。

³⁵ 見 Grünendahl 2009-2010；這自然跟重建文本同時進行。

³⁶ 至於「詞義」——我在此處並不想展開辯論——這個概念在過去幾十年時髦的解構主義中已經被批判了很久了。對於解構主義者來說，一切闡釋都是錯誤的，一切知識都是片面的——當然，要將解構主義本身排除在外——並且，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於是所有文本需要被解構；因此，精校本就成了另一個例證。

³⁷ 傳統的梵學家（Pandit）及其在西方的追隨者們堅信波你尼（Pāṇini, c. 350 BCE）把梵語語法刻進了石頭裡，因而將非波你尼的形式視為「錯誤」。然而梵語至少到一八三五年英語被確立為官方語言之前都一直被大量使用。他們最鍾愛的逃跑路線就是，「非語法」的文本一定出現在波你尼之前——遵循這樣的修正「理念」，希臘語的《新約》，中世紀非正式或是祝聖文本（例如《布蘭詩歌》，*Carmina Burana*），都該被重寫了。這將徹底地曲解這些文本：他們的作者通常不那麼瞭解「規矩」。同樣的情形發生在「非古典」的印度文獻中，例如史詩和密續。

§ 1.3.

下面就舉一個早期梵文的例子：在巴依巴拉達 (Paippalāda) 版的《阿達婆吠陀》(PS 8.12.9) 中，我們發現，即使在最為經驗豐富的梵文學者 R·毗羅 (Raghu Vira) 提供的校本裡，依然存在未被校正的殘缺詩行 (克什米爾版)：

idaṃ kuru cemāṃ surām 一句，跋吒闍梨 (Bhattacharya) 讀作 (8.12.11，或寫本)：idaṃ kodacemāṃ ³⁸ surā；而另一個奧里薩 (Orissa) 的異本 (寫本 mā) 寫作：idaṃ koda-dacemā.....

然而，原文可以通過最小的改動而被校正 ³⁹ 為：*udaṃkodaca surām (=udaṅka udaca) ⁴⁰ (噢！勺子，舀起酒來)。

通過例句可以發現，語法和拆分單詞毫無意義。而且，關於 surā (蒸餾酒) 的早期記載十分罕見。⁴¹ 無論如何，一個可行的解釋為認定動詞 ud-√añc ⁴² 的意思是「舀起」，⁴³ 進而將未經證實的部分還原為 *udaṃka 「勺子」。在西元一二〇〇年寫本的亞原本中，u- 和 i- 在圖形上十分類似 (u- > i-)，⁴⁴ 因而易於校正。我們於是得到了滿意的原文。

如果我們知道特定寫本如何發展成現在的形態 (文獻歷史，Textgeschichte, the history of the text)，那麼我們就可以運用寫本系譜的方法，結合古文書學 (paleography) 和其他研究輔助學科，從而獲得解決方案。後者很少被探討，因為當下的印度學家們忙於建立或 (重新) 翻譯一個文本，卻不關心寫本中出現的錯誤。

寫本系譜研究方法確實非常可靠。P·馬斯 (Paul Maas) 和 M·L·維斯特 (Martin Litchfield West) 曾概括這一方法。⁴⁵ 然而，也有不少關於這種方法的批評，一些質疑在拉赫曼時期就已經存在。⁴⁶ 有趣的是，十九世紀的學者 T·毛姆森 (Theodor

³⁸ 下劃線的部分表明 Bhattacharya 對於形式正確與否沒有把握。

³⁹ 上世紀八〇年代，我曾在萊頓大學的班上討論過這一問題。見 van Bijlert, in: Ghosh 2002；參見 Oort 2002。

⁴⁰ 見 Oort (2002) ud aca；又見 Upodhyaya (2010), udamkodacemāṃ surām。

⁴¹ 這是吠陀中唯一真正講到蒸餾酒的頌文。

⁴² 譯者注：「√」為動詞詞根的標記。

⁴³ 被 K. Hoffmann 認定，1975: 162-165。

⁴⁴ Witzel 1985b。

⁴⁵ Maas 1968, 1949; West 1973; cf. Dearing 1969, Tanselle 1989, 1992, Thorpe 1972. Small and Walsh 1992。

⁴⁶ Wilamowitz-Moellendorf (1959: 50, 61) 總結說：「如果這些假設有千分之一的成功機率就太令人滿意了。」J. Kenney (1974: 148, n. 1) 指出，僅有 0.1% 的推測被證明正確。參見 Schmidt 1988，特別是 Hanneder (2009-2010: 7) 談到的關於對拉赫曼方法的誤解 (不包括屢入寫本，假設所有寫本都可以上溯到同一作者的唯一版本)，還有關於印度學實踐的細節 (p. 10 sqq.)。關於二十世紀運用寫本系譜的方法對羅曼、日爾曼和斯拉夫語系進行研究的困境，關於中世紀對文本自身的「生命」的強調，以及關於核心寫本 (Leithandschrift, leading manuscript) 的重要性的提議，見 Bédier 1928; D. S. Lichayev 1971: 301-315. Colwell (1947: 109-133) 堅持認為 (對於聖經研究來說) 寫本系譜研究方法只在手頭有 (正如在古典文獻的研究領

Mommsen) 這樣描述拉赫曼：「當他真能了解主題的時候，他可以勘誤得很好。」(emendiert hat er schön, wenn er nur von der Sache etwas verstanden hätte)⁴⁷ 在二十世紀的一般性批評之後，⁴⁸ 施密特 (Schmidt 1988) 和 J·漢尼德 (Jürgen Hanneder 2009-2010) 強調了人們對於拉赫曼方法的誤解，因為拉赫曼和他的繼任者忽視了羈入現象 (contamination) (見§ 3.8.)，卻繼續運用這種方法，彷彿這個限制並不存在。

§ 2. 電腦協助下的寫本系譜

以電腦為基礎編輯和構建系譜，揭開寫本系譜研究的新篇章。⁴⁹ 總的來說，這種方法由用於構建生物學中物種系譜的電腦程式演變而來；雖然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還應用於比較語言學。⁵⁰ 奇怪的是，這些先進技術幾乎一點兒也沒有用到印度學研究中去，甚至連想都沒有人想過。⁵¹

J·弗羅傑 (Jacques Froger 1968) 開創了運用電腦進行研究的方法。通過打孔卡片 (punch-card)，他讓電腦自動校對和比較變數。⁵² 在英語世界，他的業績幾乎無人

域一樣) 幾部寫本的情況下奏效。副本理論 (copy text theory)，雖然已經過時，卻依然被盎格魯撒克遜地區的居民特別遵從。這一理論認為，傳抄的錯誤可以通過與其他寫本——常常是現存最古老的寫本 (它們顯然可能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貼近原本的版本) ——的對照有選擇地被更正。進而，像 Hanneder 總結的那樣：「傳統校勘的出路不是逃避文本精校，而是找到更好的精校方法。(Die Alternative zur herkömmlichen Textkritik kann nicht das Fehlen der Textkritik sein, sondern nur eine bessere textkritische Methode)」(2011: 100) 對這個方法另一勇敢辯護，見 Olivelle 2005: 375 sqq.：「大多數批評……基於……對批判地建構古文本的過程和目的無知、誤傳和誤解」；同樣，Schmidt (1988: 228) 說：「……很多學者並沒有文本精校、文獻歷史、寫本和編撰的親身體驗。」

⁴⁷ 參考英譯：“He has made nice emendations – if only he had understood the matter at hand,” 關於另一個有趣的軼事，見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959: 52.

⁴⁸ 見注釋 ²⁵。

⁴⁹ 這一部分主要由我的新加坡學生 Brendan Seah (B.A.) 負責輸入。——早期形式主義方法：Henri Quentin 提出「鋼鐵定律 (Rule of Iron, 1926; cf. 1922)」，建立任何三部寫本的三合一編排。盡可能將所有三個寫本的組合都結合起來以構建寫本系譜；系譜的頂端即是寫本原本。在生物學領域，Quentin 的鋼鐵定律還運用了距離法則 (distance method)。W. W. Greg (1927, 1950-1951) 提出了運用簡約解析 (simple parsimony) 的「變量微積分 (Calculus of Variants)」：簡約解析考察單個字母、詞語等在物種生成系譜不同階段的變化。Occam 規定，最好的系譜應擁有最少的 (推論的) 變化。當系譜中一個或多個分支過長的時候 (長枝牽引, “long-branch attraction”)，簡約解析則不再十分有效，例如在印度文本 (《摩訶婆羅多》) 中。這些「長枝」異文的資料和方法在中世紀印度寫本研究領域依然有待發展 (Witzel 1985a, b)。Greg (1935) 將他的方案應用於 Chester 的神秘劇《反基督》(Antichrist)。然而，他那令人生畏的代數方案遭到摒棄 (Greetham 1994: 328)。——Vinton Dearing (1969) 通過將羈入資料置於異文 (變數)「環」中而解決了羈入問題 (以及偶然同化, “incidental convergence,” 見下文) ——如果抄寫者獨立地犯了相同 (也很普遍) 錯誤，異文環將斷裂：比起假定抄寫者從面前的若干寫本擇取素材，這是更為簡約的解決方法。見 Maas in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63-120。

⁵⁰ Gray & Atkinson 2003, Ringe 1992.

⁵¹ 例外是，牛津大學電腦中的編輯程式，COLLATE (見下注)，以及最近 Hanneder 和 Maas 校勘的版本 (2009-2010)，Phillips-Rodrigues (毗鄰程式) “neighbor-joining programs” 和 Maas (簡約解析) 的論文也值得注意。

⁵² 見 Froger 1968，以及 Dearing 的評論 (1969)，參見 Fix 1984。

過問。直到最近，牛津聖典協會（Oxford Text Initiative）才注意到一些相關的隻言片語。⁵³

實際應用自動生成系譜的電腦程式則是更晚的事。生物學中的物種研究方法和以電腦為基礎的遺傳分類學系譜構造推動了它的發展。二十世紀九〇年代，⁵⁴人文學者 P·羅賓森（Peter Robinson）張貼了一個「挑戰」（1991）告示，尋找合作夥伴，運用電腦輔助方法重構古冰島語《斯威普達克之歌》（*Svipdagsmál*）的系譜。⁵⁵三位應徵者⁵⁶之一，歐赫拉（Robert J. O'Hara），使用遺傳分類學程式（PAUP）執行了一個簡約解析（parsimony analysis）：奧卡姆剃刀原則（Occam's Razor）⁵⁷堅信最好的系譜要求實際字符擁有最少變量。令人信服地，電腦生成的系譜，可以吻合用傳統方法獲得的系譜以及外部證據。⁵⁸

隨後，生化學家 C·豪（Chris Howe，劍橋大學）和羅賓森⁵⁹嘗試著用物種研究中解析 DNA 的電腦程式為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創建系譜。豪認為這個程式能夠比傳統的人工方法更好地分析系譜。但我發現研究結果⁶⁰有些幼稚。豪和羅賓森選用不同於遺傳分類學程式（PAUP）⁶¹的距離決定法（distance-related method）⁶²處理羈入現象（contamination）。他們還使用了一種分裂分解（split decomposition）的距離決定法。⁶³

⁵³ 關於他們的編輯程式 COLLATE，由牛津大學計算中心（Oxford Computing Centre）的 Peter Robinson（peterr@vax.ox.ac.uk）進行維護，參見網頁：<http://www.sd-editions.com/blog/>；關於 CollateX 和更早版本，見網頁：<http://ccat.sas.upenn.edu/gopher/other/courses/rels/735/textcriticism/textcrit.bib>。

⁵⁴ 又見 Schwob 1992, Faulhaber 1991, Marin 1991.

⁵⁵ 包括 46 個寫本；還有旁證可以對電腦構建的寫本系譜進行覆核。

⁵⁶ 另外二人使用統計分類的方法，按照整體相似性為寫本分類。

⁵⁷ 譯者注：奧卡姆剃刀原則，簡言之，即如果對同一現象有兩種不同的假說，應採取比較簡單的一種。

⁵⁸ Robinson & O'Hara 1992, 1996; O'Hara & Robinson 1993.

⁵⁹ *Discover: The world of Science*, Dec. 1998, p.34. 又見網頁：<http://ccat.sas.upenn.edu/bmcr/1992/03.03.29.html>；http://www.nyu.edu/its/humanities/ach_allc2001/papers/spencer/index.html；<http://llc.oxfordjournals.org/cgi/content/abstract/18/4/407>, etc.

⁶⁰ 正如《探索》（*Discover* 1998）中總結的那樣：「喬叟的原文是……一個進行中的草稿……〔異文極少的〕11 個寫本……吸收了那個粗糙草稿的不同版本……有大約 26 行……有的寫本有，有的沒有……喬叟一開始寫下了它們，但後來改變了主意，覺得該刪除它們。」也可能有其他的解釋，但所有這些並不屬於檢視（*recensio*），而是停留在勘誤（*emendatio*）層面。

⁶¹ 「我們偏愛的技術是在系譜中添加稜角，以便在生成的網路中將所視距離和最短距離的均方誤差最小化。」

⁶² 例如「毗鄰系譜（neighbor-joining trees）」比對兩部寫本中的特定條目，計算二者相異（「距離」）例證的數目。配對收集全部相異條目，測量每一對的相異距離，然後在與這些距離最相適的位置構建系譜。然而，在資料被提煉和概括為簡單距離過程中會遺失一些信息。

⁶³ 見 the stemmatic analyses of Dante's *Monarchia* (Windram *et al.* 2008) 和 the *Canterbury Tales* (Barbrook *et al.* 1998). ——還有一種更繁複的、數學計算的最大可能性方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常用於 DNA 的解析：建立關於寫本條目如何隨時間變化的統計學模型。這一方法可以為推論而來的系譜和實際資料的可靠性進行統計學測試。

以電腦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隨後被「新寫本系譜學家」大規模擴展（Bordalejo 2003）。⁶⁴ 基於簡約的方法（parsimony-based）尤其適合構建寫本系譜（stemmata），因為相關文字數目相對有限——但這方法不適用於《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和《摩奴法論》（*Manusmṛti*）之類的印度寫本，它們數量龐大，生成系譜複雜，伴隨多重同化（convergence）和羈入現象（contamination）。⁶⁵

電腦方法滲透到印度學領域（以及據我所知其他傳統東方文獻學領域）的部分微乎其微，⁶⁶ 可幫我們獲得原本的希望仍未可知：⁶⁷ 校對工作決定包括哪些變量，⁶⁸ 評判計算結果，這些工作所需的心思，仍需要文本校勘者（textual critic）的腦和手，以及他對相關歷史層面的敏感。雖然從理論上講，為了構建一個系譜，如今他們可以花更少的時間在相對機械的工作上，但文獻學家無法被取代。構建系譜只是編輯精校本的第一步。豪斯曼的「運用心思（application of thought）」同樣必要。

§ 3. 印度文本精校的具體問題

對印度文獻而言，用寫本系譜的方法校勘的精校本很少。即便在今天，名為「精校本」的版本往往只是異文「精選」。⁶⁹ 甚至普納（Poona）的最新成果⁷⁰ 也沒有構建系譜。在過去二百年，只有一打左右擁有寫本系譜的真正的梵文精校本問世。⁷¹ 格魯南德（Grünendahl 2010）列出了幾部最近出版的精校本。⁷² 勞（Rau 1960）和奧

⁶⁴ 見網頁：<http://www.textualscholarship.org/newstemmatics/index.html>。

⁶⁵ 我們需要運用全部資料，可能需要通過掃描和光學字母識別（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見 O. Hellwig 的最新成果，參見網址：<http://www.sanskritreader.de>；Peter Scharf 和已故的 Malcom Hyman，布朗大學和哈佛大學 Houghton 圖書館，網址：<http://sktlib-dev.ccv.brown.edu/tomcat/sl/>）。關於《摩訶婆羅多》寫本的支脈，超出籠統分支而細分到各個寫本傳統的部分，見 Grünendahl 1993。

⁶⁶ 見 Phillips-Rodriguez 和 Maas in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⁶⁷ 參見 Hellwig；關於印度點金術的寫本系譜，見網址：http://rezaei.typepad.com/hassan_rezaei/files/Tagungsprogramm_DOT2007.pdf。

⁶⁸ 也就是說，包括飽受爭議的「簡單拼寫」異文（例如 *ṃ* 同構鼻音，見 3.8 注釋）。

⁶⁹ 見 Hanneder 的綜述，2009-2010: 7 sqq. 在“Use of Manuscripts in Textual Criticism by our Commentators”（見 V.V. Dwivedi and Janardan Pandey, ed. *Sampādāna ke Siddhānta aur Upādāna*, Sarnath: CIHTS, 1990）一文中，Ram Shankar Bhattacharya 提及自己正在進行的長篇研究也涉及到同一問題。

⁷⁰ 見 Dharmadhikari *et al.* 1990。——Hanneder (2009-2010) 的著作，雖然他贊同十九、二十世紀的無系譜「精校」本；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版本是半精校本；貝拿勒斯的往世書版本沒有標注異文。

⁷¹ 見 Witzel 1997, introduction. 關於對十九世紀校勘者的辯護，見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⁷² 最近出版的真正的梵文精校本：R. Lariviere, *The Nāradaśmṛti*, 1989; A. Wezler and S. Motegi, *Yuktidīpikā*, 1998; Ph. Maas, *Samādhipāda of Patañjali's Yogasūtra*, 2006; J. Mallinson, *The Khecarīvidyā of Ādinātha*, 2007。——參見 Witzel 教授的目錄（Witzel 1997: vii）。在吠陀領域：Maue, *Bṛhadāraṇyakopaniṣad*, 1976; Witzel,

列維 (Olivelle 1998) 認同奧義書的幾個版本。⁷⁶ 格魯南德 (Grünendahl 2010) 正確地強調說，一個精校本的目的應具有普遍的「可回溯性」(Nachvollziehbarkeit)，即讀者可重複校勘的過程，並可理解甚至修正編者的決定。⁷⁴

§ 3.1. 半精校本

準確地講，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學者所整理的精校本沒有「可重複性」，又因其沒有使用寫本系譜，所以只能算半精校本。我在一九九七年曾批評過這個方法：⁷⁵「在公共圖書館和私人藏書中，有數百萬的印度寫本，其中只有支離破碎的極小部分——沒人知道究竟多少——被正式出版或作為某些版本的依據。至今為止，我們只有一小撮用寫本系譜整理出來的梵文精校本。」大部分版本在複製拉赫曼之前學者的工作。它們僅僅是憑著對語法、習語的敏銳理解，以及對「最佳寫本」的發揮運用。

即使最著名的印度作家如迦梨陀娑 (Kālidāsa)⁷⁶ 或商羯羅 (Śaṅkara)，他們的作品依然沒有精校本。這實在是不名譽的事。精校本的缺失使我們很難精確地知道作者的意圖。⁷⁷ 專業的學術研究如果以目前的非精校本為依據，最多也只能是個暫時性的成果。然而，當今的印度學學者往往認為手頭的版本理所當然，而沒有努力校勘出更完善的版本並提供更精確的譯文。

Kātha-Śikṣā-Upaniṣad (1977), “Die Kātha-Śikṣā-Upaniṣad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Kṛṣṇavalli der Taittirīya-Upaniṣad” (1979-1980); Y. Ikari’s “Vādhūla Śrautasūtra I.1-4 (Agnyādheya, Punarādheya),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Vādhūla Śrautasūtra, I.” (1996); M. Deshpande’s *Śaunakīyā Caturādhyāyikā: a Prātiśākhya of the Śaunakīya Atharvaveda* (1997); Zehnder’s *Atharvaveda-Paippalāda Buch 2* (1999); Lubotsky’s *Atharvaveda-Paippalāda. Kāṇḍa Five* (2002); Lubin’s *Nīlarudropaniṣad* (2007); Olivelle, *Manu’s code of law (Manu-Smṛti)* (2005) and *The law code of Viṣṇu (Viṣṇu-Smṛti)* (2009); Griffiths’ *The Paippalādasamhitā of the Atharvaveda, Kāṇḍas 6 and 7* (2009); C. Lopez’s *Paipp. Saṃh 13-14* (2010)。——另外，Kölver, *Rājatarāṅgiṇī*, 1971 (based on Vishva Bandhu 1963-1965) 和 K. F. Geldner (Avesta edition 1886) 這兩部著作在校勘完成之後重構了系譜。Srikanth Kaul, *Rājatarāṅgiṇī of Jonarāja*, Hoshiarpur (1967: 10-30) 有一個包含論述的清晰系譜。

⁷⁴ 「標準」Limaye-Vadekar 版本 (1958) 不是精校本，甚至幾乎沒有提及異文。M. Fujii 正在校勘的古老的幾乎被遺忘的 Jaiminiya Upaniṣad Brāhmaṇa 也不是精校本。

⁷⁵ 見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18 sqq. 書中還包括：Introduction by Jürgen Hanneder pp. 5-16; R. Grünendahl, Post-philological gestures – “Deconstructing” Textual Criticism, pp. 18-28; Pascale Haag: Problems of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Grammatical Literature: The pratyāhāra Section of the Kāśikāvṛtti, pp. 45-62; Philipp A. Maas: Computer Aided Stemmatics – The Case of Fifty-Two Text Versions of Carakasamhitā Vimānasthāna 8.67-157, pp. 63-120; Christina Pecchia: Transmission-specific (In)utility, or Dealing with Contamination: Samples from the Textual Tradition of the Carakasamhitā, pp. 121-160.

⁷⁶ Witzel 1997: Introduction. Hanneder (2009-2010) 對一千八百年後的印度學研究實踐持更為節制的和平主義態度。

⁷⁷ Scharpé 的版本 (1954-) 僅僅基於之前的版本。

⁷⁸ 例如，S. Mayeda 研究，1967: 33-55, cf. WZKS 9 (1965): 155-197.

我曾將版本分為三類：⁷⁸

其一，「傳統」印度版本：完全沒有或僅有很少的異文（pāṭhabheda）被列出，幾乎從來沒有出處，即使有也只是用字母 ka, kha, ga 等區分，沒有更多的說明。

其二，十九世紀版「精校本」。一個典型的不良範例就是博伊特林克（Boehtlingk）的《廣林奧義書》（*Bṛhadāraṇyaka Upaniṣad*）。⁷⁹ 羅特（Rudolf Roth）版和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版的《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 1856），⁸⁰ 以及杜加默汗（Durgamohan）和 D·跋吒闍梨（Dipak Bhattacharya）的新版巴依巴拉達《阿達婆吠陀》（*Paippalāda Atharvaveda* 1964, 1970, 1997, 2008），即便沒有那麼糟糕，也都遵循了這種不科學的模式。

其三，真正的精校本，如進行中的《王河》（*Rājatarāṅgiṇī*），依然鳳毛麟角。例如，《王河》的系譜，是在 V·槃豆—考爾（Vishva Bandhu-Kaul）提供的材料（1963）的基礎上，由科渥（Kölver 1971）⁸¹ 努力地構建起來。

其他文獻版本關聯到流傳過程中的不同階段。以《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為例，我們可以構建其不同的編撰版本，⁸² 例如南印度「通行」本（vulgate version），或青頸（Nīlakaṇṭha）的北印度「通行」本。⁸³ 它們有各自的內在價值。最終，基於北印度支脈和南印度支脈兩個傳統⁸⁴ 重構而形成了一個新的版本，即普納版《摩訶婆羅多》。這個新版本當然也保存了很多紀元初期幾世紀史詩文本的特色，然而無論如何絕非原本——由於所有史詩創作的內在屬性（正如派瑞〔Parry〕和洛德〔Lord〕所指出的）。即使我們不能確切獲得原文的詞句，我們依然可以接近某些核心。

在當前案例中（或者，以商羯羅，摩奴或是迦梨陀娑的作品為例），由於寫本數量衆多，很難收集和對比研究全部現存寫本。因為不可能知道某個寫本可以直接對應到哪個傳播源流（新寫本不等於壞版本，*recentiores non deteriores*），即使是很晚的抄本

⁷⁸ 見我對羸入現象和（所推薦的）精校本的詳細論述；關於 Patañjali's *Mahābhāṣya*, *Kāśikā*, *Nyāsa* 和 *Padamañjarī* 等語法文獻，見網址：http://groups.yahoo.com/group/Indo-Eurasian_research/message/6244，參見 P. Haag，前文注釋。

⁷⁹ Böhtlingk 1889，和他的 *Khândogjopanishad* 1889. Whitney (1890: 412) 正確地批判了 Boehtlingk 的實踐，然而他自己的版本卻有著同樣問題（見下注）；參見 Olivelle 1998.

⁸⁰ Roth 和 Whitney (1856) 沒有提供異文，並且大肆修改了某些章節；在 Whitney 的辭彙索引（1881）和翻譯（1905）中提供了寫本的部分異文。相比之下，Pandit 的版本（1895-1898）引用了大量寫本，只是沒有寫本系譜；他的長篇導論很有幫助，卻已經幾乎被遺忘了（除了 Witzel 1986, Deshpande 1997）。

⁸¹ Kölver 1971.

⁸² 參見 Lichayev 1971，關於俄羅斯「考據學」方法；注意 M. Ježić 2005，關於《羅摩衍那》（*Rāmāyaṇa* 2005）和《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 1986）中的層次。

⁸³ Nīlakaṇṭha's *Mahābhārata* (1888).

⁸⁴ 見 Grünendahl 1993.

也不能隨意丟棄。在尼泊爾，不少很新的抄本被證實抄錄自一千年前的古寫本。⁸⁵當然，我們在確立寫本系譜之前不能知道更古老的寫本是否具有更高的價值。

在這類資料豐富的窘境中——假如一位學者真的可以獲得全部寫本——他最好實施一項導航計畫，研究這些寫本的特定章節如何匹配。⁸⁶以電腦為基礎的校勘會有所幫助。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下錄入工作還需人工完成，因為對印度寫本進行文字識別的掃描實在是太不盡如人意了。⁸⁷

印度的情況與西方古典研究或聖經研究截然不同。後者文藝復興前的寫本所存數量很少；而南亞，將近三千萬的寫本存在於官方或是常常被遺忘的私人收藏中：⁸⁸每個村莊都會有婆羅門的家族收藏，多少各異，而總共有大約六十萬的村莊……這種狀況不僅帶來了獲取文獻的障礙，⁸⁹還製造了一種資料豐富的窘境。任何一個單槍匹馬的學者都不可能獲取、處理或使用甚至一個特定的版本。⁹⁰

儘管總量巨大，寫本卻不斷遺失損毀，讓人痛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早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就在印度開始實施「先鋒微縮膠片工程」（pioneer microfilm project），⁹¹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文化中心（Indira Gandhi Cultural Center）也有一項計畫，即拍攝或掃描所有圖書館的館藏。⁹²然而，儘管還有為期十年的「國家寫本保護計畫」（National Mission for Manuscripts, 2003-），所拯救的文獻不過是滄海一粟。⁹³很多公共或私人圖書館的藏書被蛀蟲、老鼠、火災（為了防蛀，寫本常常被保存在煙囪裡）、水災所破壞，或是被視而不見。⁹⁴

⁸⁵ Lokesh Chandra 在他的百藏叢書（Śatapiṭaka Series）中出版了部分被重新抄寫的古加德滿都寫本；這些寫本的出處僅在梵本抬頭和現代的版權尾頁中得以辨識。關於另一相似情況，帶著抄寫者或是讀者修訂痕跡的 Ratnakaṇṭha's Stutirahasya and Ratnaśataka，見 S. Jager in Hanneder and Haag 2009-2010: 285-294.

⁸⁶ 另外，這一過程可能在文本的其他部分獲得驚人發現。——Olivelle 率先實施了 53 個寫本的導航計畫，為《摩奴法論》的精校本做準備。儘管有為數眾多的屢入現象，Olivelle (2005: 370 sqq.) 沒有依據詳細的寫本系譜就辨別出了《摩奴法論》的北部和南部兩個傳統。這與我們在 Bhāruci 中见到的情形類似。

⁸⁷ 見 O. Hellwig 主持的幾個柏林計畫，例如 Sanskrit OCR（參見網址 <http://www.sanskritreader.de>；http://kjc-fs-cluster.kjc.uni-heidelberg.de/dcs/index.php?contents=help_center）。

⁸⁸ 注意 Jade 收藏的 6,000 部寫本（K.V. Sarma 2007: 69-79）；Kavindra 的 2,192 部寫本目錄（Anantakrishna 1921），還有二十世紀尼泊爾學者和 *rājaguru* Hemrāj Pāṇḍe 收藏的 8,000 部寫本。

⁸⁹ 最近這種情況由於掃描和網路的發展而稍有改善，例如本地治里（<http://202.71.128.164:9080/opac/fip/html/SearchForm>），欽奈的 Government Oriental Manuscript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http://www.tnarch.gov.in/script.htm>），新德里的 IGNCA（<http://www.ignca.nic.in>）：Home > Kalanidhi > Microfilm / Microfische > Digital Library > Manuscripts Catalogue > Manuscripts in India (Survey)；然而，由於寫本原收藏館的官僚主義作風，IGNCA 寫本並不容易見到。

⁹⁰ 參見 Hanneder 2009-2010: 14。在這些案例中，導航計畫有助於正確篩選寫本。

⁹¹ 作為印度當地收集「最重要」寫本的代表，膠片現在存放在 Toyo Bunko, Tokyo (1971-1973)。

⁹² 三座最大的南印度圖書館已經在一九九二年完成全部掃描；近期掃描成果，見 IGNCA, Delhi（參見網址：<http://www.ignca.nic.in>），不過有不少鏈結打不開。

⁹³ 見網址：<http://www.namami.org/>。

⁹⁴ 我曾聽說奧里薩的一座過去的王公圖書館，把書「收藏」在雨季的陽臺上；並且我曾親見大捆的文獻放在加德滿都皇家 Vasantapur 宮殿（1975）無人問津的角落。

§ 3.2. 注釋者和旁證

正如寫本系譜學中常常討論的那樣，⁹⁵ 不只是寫本本身，相關旁證也應受到重視。例如記載於碑銘中的罕見引文（例如西元五〇〇年前後對摩奴的引用），或是被刪除的文字（例如被安主 Kṣemendra 刪除的文字），或是其他證據，⁹⁶ 或是各種注疏。

W·勞（1960）強調，編訂商羯羅的《廣林奧義書注疏》（*Bṛhadāraṇyaka Bhāṣya*）精校本，需要重構最早的《廣林奧義書》版本，而這就需要運用「旁證」（testimonial）這個眾所周知的精校理念。大約三十年後，P·奧列維（Patrick Olivelle）⁹⁷ 還在抱怨人們對注釋者的持續偏見，和他們對口傳文本（包括寫本）的依賴（1998：2）。

然而，在注釋被用作旁證之前，先要仔細校勘這些注釋；⁹⁸ 這是一個類似於「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情形。我們並不知道注釋中的引文有多真實或是屬雜。⁹⁹ 僅只當一個注釋者實在而詳細地討論一段異文（pāṭhabheda）的時候，我們才能相當確信。跟我們一樣，注釋者認為某些異文是真正的錯誤，即商羯羅（Śankara）所稱的「誤讀」（pramādaṣṭha）。¹⁰⁰ 因此，商羯羅的《奧義書注疏》的良好版本¹⁰¹ 可以在極大程度上有助於確立《奧義書》的原本。雖然尼亞沙（Nyāsa）注釋的《僑尸迦》（*Kāśikā*）¹⁰² 只有半精校本，但現在人們認為其對理解原文大有裨益，並且間接地有助於對波顛闍利（Patañjali）的《大疏》（*Mahābhāṣya*）的理解。¹⁰³

反之亦然。當《奧義書》不再只是通過嚴格的吠陀口傳傳統傳播，注釋也可能影響到《奧義書》的寫本。¹⁰⁴ 一個很好的例證是《廣林奧義書》（以下簡稱《廣林》，*BĀU* 4.3.1）中樹皮仙（Yājñavalkya）和遮那伽（Janaka）的對話，連讀（lectio continua, continual reading or spelling）是 *samenenavadiṣye*，可以拆解為“*sam enena vadiṣye*”，

⁹⁵ 例如 Katre 1954, Maas 1968, Hanneder 2009-2010: 15, 等等。相關情況是一些學者的更正，大多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⁹⁶ 例如，《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甚至可以在印尼找到旁證（Gonda 1935）。

⁹⁷ Olivelle 1998, esp. p. 173.

⁹⁸ 來自印度的造訪者問我在將來的研究中該如何做，如此徒勞。這令我印象深刻。—— Olivelle 抱怨（2005）注釋者不可靠；Müller（1849）也發過類似的牢騷，R. V. ed., preface to 2nd vol.: xxviii, Whitney 1893.

⁹⁹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 Chowkhamba 版 Jayanta Bhaṭṭa's *Nyāyamañjarī*（1969-1971）；編者忠實地照搬了沒有出處的咒語引文，帶著全部中世紀克什米爾發音的訛誤，參見 Witzel 1994: n. 211.

¹⁰⁰ Olivelle 1998.

¹⁰¹ Olivelle 1998, ann. 4.

¹⁰² 譯者注：即 *Kāśikāvṛtti*，波你尼語法的注釋。

¹⁰³ 見 Kielhorn 1880-1885。關於僅使用西北印度寫本，見 Witzel 1986；參見前文注釋。關於 Aryendra Sharma 的半精校本 *Kāśikā*，這個版本也使用了南印度寫本，見 P. Haag in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¹⁰⁴ Olivelle 並未提及。

即「我將跟他說話」；或是“sa mene na vadiṣye”，即「他想：『我將不說話』」。標明重音的版本就能解決這一歧義：sám enena vadiṣye 或是 sá mene ná vadiṣye。然而，有商羯羅注釋的《廣林》Kāṇva 本（BĀU-Kāṇva）的印本沒有標明重音；而《廣林》Mādhyandina 本標有重音。事實上，《廣林》Kāṇva 本的寫本也是有重音的。¹⁰⁵ 然而就是《廣林》Kāṇva 的寫本在這一上句上也不一致。究竟是哪個版本在何時影響了另外版本？值得注意的是，商羯羅（Śaṅkara）和阿難陀吉利（Ānandagiri）都將這一句理解為「我將不說話」。

最後，用轉述、寫本流傳建立系譜校勘，和文本的內在解釋（注釋），兩者並不相排斥。我們僅僅需要依次地使用它們：精校本是針對原本（或者說，它們的原型）而言，而注釋等旁證可以協助此一過程。

§ 3.3. 「較難讀法原則」（Lectio difficilior）

由於更不尋常或艱深難懂的解讀常常更可能是正確的，因而「偏愛較為複雜的解讀而不是較為簡單的解讀」，此謂「較難讀法原則」。¹⁰⁶ 這帶來了另一難題。寫本的抄錄者（和閱讀者）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寫本中用「正確」替換「錯誤」；這種情況常常是由於對一些古老或罕見詞語的誤抄或誤解。例如《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中常常使用相同長度或相同韻律的同義詞。當這類文本以寫本形式展現，就會導致「優美」然而非作者本意的解讀。

文獻學的做法偏愛艱澀的解讀，因為這可以讓日後的讀者重新考察這個難題。在文本中安插一個「簡單」的解讀就是埋沒了問題，這樣一來讀者可能就不會再核查相關的注釋了。明智的校勘者將那些「簡單」解讀（包括很多個人猜測）貶斥為校勘原始素材（critical apparatus）。¹⁰⁷ 直白的解釋只會「創造出一個新的而且是不忠實的傳本，誤導日後的學者」（Olivelle 1998）。¹⁰⁸

¹⁰⁵ 關於重點闡發《百道梵書》（Śatapatha Brāhmaṇa）和《廣林奧義書》寫本（BĀUM, Bṛhadāranyaka Upaniṣad Manuscript）的自身問題，見 K. Hoffmann 1976: 387-402.

¹⁰⁶ 參見 Olivelle 1998, ch. II; Hanneder 2009-2010: 11 sqq. 這是校勘者應該獨立做出的眾多決定之一，超出檢視（recensio）的範疇，尤其當寫本分支的校勘異文同等重要的時候。

¹⁰⁷ 譯者注：校勘原始素材，即在文本精校過程中，不同版本異文的羅列。

¹⁰⁸ Boehtlingk 或 Roth-Whitney（1856）扮作亞歷山大學者、中世紀抄寫者、注釋者和當代梵學家：他們偏愛自己的判斷；而他們的判斷有時與寫本中所有證據和旁證相左。

§ 3.4. 原本 (archetype), 亞原本 (hyparchetype) ⑩ 和通行本 (vulgate)

如果我們通過敏銳觀察各種寫本及其系譜，獲得了文本，我們的目標就是校勘這個版本。有些實例，例如《摩奴法論》的文本，我們有一個龐大的支脈，以大部分北方和南方寫本為代表，其中包括一個早期的婆盧支 (Bhārucci) 注釋本，屬於南方支脈 (Derrett 1975: 29 sqq., 17 sqq.; 1964; Olivelle 2005)。我們於是必須依據兩個支脈重構原本，並且面臨著一個雙重祖本的情境。這在希臘羅馬 (Graeco-Roman) 的文獻中非常典型。

一個類似卻超乎尋常的例子是迦爾訶那 (Kalhaṇa) 的《王河》(Rājatarāṅgiṇī) 第八卷。這一卷共有兩個版本的亞原本，都出自同一作者之手。⑪ 最初版本很不討當朝國王喜歡：迦爾訶那的父親被解除了大臣職務，因而迦爾訶那對當朝政權沒有好感。然而，當《王河》被下令提交給朝廷過目，迦爾訶那重寫了卷八的大部分章節，讓國王顯得更可親。⑫ 這裡我們有了一個梵文研究中的獨特例證——就像研究西方詩人一樣——早期和晚期的版本均被保留。一個未來的精校本需要同時反映兩個版本的內容，最好是平行展示，這樣才能清晰地顯現詩人思想上的變化。⑬

通行本對於理解中世紀傳統之前的文本幫助不大。而那個時候，沒人試著寫一個關於《大疏》(Mahābhāṣya) 或《奧義書》等寫本的綜述，也沒人關注《奧義書》當時尚存的口述傳統。⑭

然而，如何解釋全部非婆盧支 (non-Bhārucci) 寫本的《摩奴法論》都遵循了現存的南、北 (通行) 本？這些內容在貝拿勒斯 (Benares) 的古寫本中就已經存在，⑮ 由勝月天 (Jayacandradeva) 在一一八二年撰寫而成。⑯ 這在印度十分普遍：當更傑出的版本——常常封裝在注釋中——橫空出世，更古老的文本就被遺忘了。因此，我

⑩ 譯者注：hyparchetype 來自希臘語，等同於拉丁語源的 subarchetype，均可譯為亞原本。

⑪ M. A. Stein 在一九〇〇年研究和描述了這些寫本，進而，Vishva Bandhu、Kaul 和 Kölver (1963/1971) 也分別做了研究。Hultsch 偶然得到一個很新的第八卷 Śāradā 寫本 (現在藏於柏林)，與通行本差別很大。——另一案例，見 P. Harrison on Śāntideva's Śikṣāsāmucaṃyā,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13.

⑫ B. Kölver 1971，包括相關寫本的影印件。

⑬ 這一絕妙案例還展現了眾所周知卻少有記載的梵語詩人對宮廷的依賴。與之類似，《Nīlamata 往世書》也有長、短兩個版本。為了一八六〇年代新印度克什米爾國王，長版被 Pandit Sahebrām 「重建」(Bühler 1877)。

⑭ 《廣林奧義書》寫本在北印度的某些區域，如古吉拉特和馬哈拉施特拉，奧里薩的 Kāṇva 本以及零星「各處」(sarvatra) (見 Yajurvedavṛkṣa)；在喀拉拉有 Jaiminīya Upaniṣad Brāhmaṇa (Fujii 正在校勘)，在南印度有 Taittirīya Upaniṣad，那裡「連隻家養的貓都懂《夜柔吠陀》」，等等。

⑮ 見 Manu, ed. Olivelle, 2005.

⑯ 收藏在加德滿都的 Kesar 圖書館，年代是一一八二年，見 Witzel 2001: 263.

們缺失了之前的文本，比如，六派哲學的系統文獻；只有在《彌曼差經》（*Mīmāṃsā-Sūtra*）、《正理經》（*Nyāya-Sūtra*），《瑜伽經》（*Yoga-Sūtra*）等文獻中還留存一些與之相關的經典表述。更早的版本僅在引文中被偶然提及。印度屬於熱帶氣候，古貝葉（palm leaf）和之後的紙質寫本很難保存超過四百年。¹¹⁶ 如果人們對特定文本失去興趣，他們將不再重新抄寫它，於是過不了多久它就消失了。更糟糕的是，在印度，書寫文本沒有實質價值；傳統梵學家的傳誦和教學才更為重要。¹¹⁷ 一個寫本「總是可以被複製的」。

這種情形跟生物學的物種滅絕非常類似。最後的結果是，只有那些被寵愛的文本得到「繁衍」，而更早傳統的遺跡，比如婆盧支的版本，只能或多或少地在南亞次大陸的零星角落裡苟延殘喘。所有其他（通行）寫本是「新」文本的後裔，從而產生了現今在遺傳學中被大肆討論的典型的「瓶頸」現象。¹¹⁸

§ 3.5. 書寫形式（scripts）和古文書學

在校勘過程中，人們幾乎沒有注意到書寫形式發生過至少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西元四〇〇/五〇〇年間，從後期婆羅謎（late Brahmi）字體到笈多（Gupta）和南帕拉瓦（southern Pallava）字母的轉變；第二次，從後期笈多體（悉曇，Siddhamātrikā，Siddham）到早期城體（Nāgarī，分為東城體和西城體）的轉變。¹¹⁹ 很快地，早期的寫本不再容易閱讀，從而使抄寫者頻頻犯錯。例如，悉曇體的 ta 看起來像城體的 u（उ）；或是前置母音（pr̥ṣṭhamātrā vowels）¹²⁰ āka 被當成了 ke，ākā 被當成了 ko，¹²¹ 等等。在西元一〇〇〇年到一二〇〇年間將寫本轉寫為城體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錯誤。¹²²

¹¹⁶ 除了拉賈斯坦、尼泊爾和克什米爾的古寫本。參見 Sarma 1985.

¹¹⁷ 佛教和耆那教文獻不包括在內：耆那教徒將他們的經典保存得很好，例如在齋沙默爾（Jaisalmer）寺廟下面的洞穴裡；（西藏的）佛教徒簡直是膜拜他們的經書。與之相對，我曾親眼目睹印度的梵學家從兩米高的書架上把一千年前的古寫本漫不經心地丟落在地。參見 Pollock 2007.

¹¹⁸ 有趣的是，十九世紀抄寫的尼泊爾寫本，即一八五九年 Weber 的 Kātyāyana Śrautasūtra 版本，開啓了新的寫本傳統。這一版本從正文到 Weber 的交叉引用，都直接來自印本。

¹¹⁹ 見 Witzel 1985b. 沒有適於研究寫本的很好的古文書學。有一些通識的書，大多關於碑銘，例如 Singh 1991（關於天城體）。

¹²⁰ 譯者注：前置元音（pr̥ṣṭhamātrā vowels），即梵文字體中，不在字母上部加斜線來表示 ke（के），ko（को），等等，而是加在字母之前，用 क्表示 के，用 क्का表示 को，等等。

¹²¹ 由於誤解作為前字母尾音的 क्（如 क्क等等）而產生的頻繁錯誤，最早的例證之一是巴利文的政府官銜目錄：rāja，cora，amātya……，譯作「國王，小偷，大臣……」。然而之前的城體中卻書寫為 राजाचार rājā-cāra「國王，奸細……」，而非巴利文的 राजाचोर rājā-cora「國王，小偷……」。

¹²² 在其他地區同樣經歷了相似過程。例如，在南印度；或是奧里薩地區，一四〇〇年前後從東城體向奧里亞體（Oriya）轉換的過程中，等等。參見 Sarma 2007, Einike 2009.

這種情形跟九世紀時希臘文字母從安色爾體 (uncial) 轉變成草寫小字體 (miniscule)，以及中國秦朝時漢字脫離其古老象形文字，並無二致。然而，印度學家們卻從未注意到這類問題，所以笈多時期寫本幾乎失傳，¹²⁵ 或是研究稀有的早期寫本的古文書學幾乎不存在。¹²⁴

對於那些以地域傳統 (local tradition) 為主導的文獻來說，情形可能稍有不同。例如克什米爾文獻中，發展緩慢的薩拉達 (Śāradā) 字體沒有導致如悉曇體轉城體時產生的衆多訛誤——錯誤的多少取決於笈多體變化程度的大小。¹²⁵ 考察這一過程可以提供更實用的工具和更好的版本。我在一九八六年就提出這樣的研究方向，¹²⁶ 卻沒有被採用，只有在柏林/哈雷的印度寫本計畫 (Indoscript project) 中有少數的運用。¹²⁷

§ 3.6. 「瓶頸」效應 (bottlenecks)

城體 (Nāgarī) / 格蘭塔字體 (Grantha) 造成的瓶頸效應，使得古寫本不易理解，容易遭到遺棄。¹²⁸ 一個新而成功的文獻「物種」在西元一〇〇〇年前後應運而生，也就不奇怪了。我懷疑，大多數熟知的「古典」文獻都是來自這一時期的原本，即被撰寫於 (亞) 地域書寫形式出現之後。¹²⁹

另一個瓶頸效應產生自某些知名學者尋求熟知的「更優秀」寫本，甚至不惜千里迢迢、幾經商人之手購得。¹³⁰ 迦維因陀羅阿闍梨·娑羅私婆蒂 (Kavīndrācārya Sarasvatī)¹³¹ 或闍底 (Jaḍe) 的收藏是有名的例子。新出的著名寫本於是成為 (亞)

¹²⁴ 除了南亞的西北地方和新疆出土的極其罕見的笈多體寫本，在尼泊爾還有一些後期笈多體寫本 (當地的碑銘為書寫形式的發展提供了有用的覆核)；年代最早的寫本是西元八一〇年的《室健陀往世書》(Skanda Purāna) 寫本，藏於尼泊爾國家檔案館 (Nepalese National Archives)。更多的尼泊爾寫本是西元十、十一世紀的悉曇體寫本。

¹²⁵ 除了新疆。見哈雷-柏林計畫，其目的是涵蓋所有印度寫本 (見網址：<http://www.indologie.uni-halle.de/forschung/indoscript.htm>)。參見 Salomon 1998。

¹²⁶ 在這之前，娑羅謎字體發展成笈多體。但除了 Patañjali 的 Mahābhāṣya (Witzel 1986) 之外，此一可能性從未被想過或加以證實。這點可對其他早期文獻，諸如馬鳴 (Aśvaghōṣa) 的《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或是屬於前笈多部分的《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提供什麼新知呢？

¹²⁷ Witzel 1986b.

¹²⁸ 在其他方面，僅有少數學者研究古中亞、吉爾吉特和新發現的健陀羅寫本，其他學者研究的古尼泊爾寫本伴隨古文書學疑難雜症。

¹²⁹ 參見現在健陀羅考古中「被埋葬」的古老的，或殘破的寫本內所獲之案例，Salomon 的論文，參見網址：<http://gandhari.org>。

¹³⁰ Witzel 1985b: 256 sqq.

¹³¹ 我不時見到相關的事例。注意寫本的買賣，例如克什米爾學者 Bhaṭṭa Haraka 抄寫的完成於一六八二年七月十日星期四的《摩訶婆羅多》寫本。參見 Katre 1954: 29，同樣關於寫本買賣，不過沒有提及真實事件。Derrett (1975: 29, 32) 討論了尋找北部、南部和東部「最好的」印度寫本；這些寫本在《摩奴法論》的注釋 (例如婆盧支的注釋) 中被擇選使用。——還應注意傳統思潮 (下文)。

¹³² 一批十七世紀收藏的 2,192 件寫本，在一九二一年由 Ananta Krishna Sastry 編輯出版 (詳見 Gode 1954: 341, K.V. Sarma 1980: 78)，參見前文注釋。還可參見十八、十九世紀 Jaḍe 收藏的 6,000 件寫本 (VVRI

原本，最終排擠掉其他地域傳統的寫本。最後，兩類寫本，例如北部和南部寫本，建立起一個「新」的泛印度傳統。¹³² 我們再次遭遇典型的兩條支脈的系譜。¹³³

貝迪耶 (Bédier)¹³⁴ 指出這些資料可以建立不止一個寫本系譜；然而薩爾曼斯 (Salemans)¹³⁵ 證明眾多寫本系譜相互關聯，如果用生物學術語解釋，就是同一的無根 (unrooted) 的拓撲 (topology)。¹³⁶ 一個終極「根」位，即原本 (或作者的手稿)，是不確定的。在生物學和語言學中運用物種 (系譜) 研究方法時，這一問題同樣存在：它迫切要求外在於文獻的旁證。而旁證，在多數印度系統的文本中是很難找到的。

上述的材料卻有助於重構原本，如用在基爾霍恩 (Kielhorn) 版的《大疏》 (*Mahābhāṣya*) (單一原本)，¹³⁷ 還有巴依巴拉達版《阿達婆吠陀本集》 (*Paippalāda Saṃhitā*)，¹³⁸ 而且可例外地用在同一作者迦爾訶那 (Kalhaṇa 1150/1151 年) 撰寫的兩個版本。¹³⁹

§ 3.7. 口述傳統

由於篇幅有限，吠陀¹⁴⁰、史詩和早期佛教文獻極強的口述傳統在此處不做討論。這些口述傳統的文獻限制了 (後期) 書寫傳統的價值。一個相關論題是音樂傳統對早期新印度——雅利安宗教文獻¹⁴¹ (及《娑摩吠陀》) 的影響。

§ 3.8. 羈入現象 (contamination)

如果不同的寫本家族沒有彼此隔絕，而是某個抄寫者在抄錄寫本的過程中，參考了其他多個寫本，並選擇了其中的某些段落放入他的寫本，這樣就產生了寫本系譜的

Hoshiarpur, MS 5649)。據說貝拿勒斯的 Sarasvati Bhavan 圖書館 (梵語大學) 購買了這批寫本，可能在一九三四年之後；參見 K. V. Sarma 2007: 78.

¹³² 有時印度傳統甚至記錄下這些案例，例如聲稱將語法論文《大疏》 (*Mahābhāṣya*) 重新引入到中世紀早期的克什米爾，見 Rājatarāṅgīnī, 4.488；參見 Aklujkar 2008。——這些案例導致把從邊遠地區，如克什米爾、喀拉拉或是尼泊爾，拯救的文本重新引入印度和印度學的意識。

¹³³ Bédier (1928) 的研究，由於寫本失傳的可能性極大，他的統計學表明僅存在兩個分支，其中之一可能來自從兩支系譜中脫落的較晚支脈，尤其是當羈入現象出現的時候。見 Weitzman 1987: 301.

¹³⁴ Bédier 1928.

¹³⁵ 詳見 Bordalejo 2003.

¹³⁶ 譯者注：拓撲 (topology)，即連續性變化中的變形現象。

¹³⁷ Witzel 1986.

¹³⁸ 一個中世紀古吉拉特原本，擁有克什米爾和奧里薩兩個亞原本，見 Witzel 1985a, b.

¹³⁹ Kölver 1971。——鑒於上述例證，Salomon 的話 (1991: 48) 相當可疑：「不論一個真正的精校本是否可以澄清《六問奧義書》 (*Praśna Up.*) 的文本和語言學問題，或是不論這種版本是否可行」。

¹⁴⁰ Staal 1961, 1986；參見 Colas and Gerschheimer 2009.

¹⁴¹ Callewaert 1996.

屬入現象。¹⁴² 其他例證頻繁見於梵語史詩中，比如抄寫者為保持詩律完整而不自覺地插入一個詩中詞語的近義詞。拉赫曼和他的眾多追隨者為求捷徑，從他們的寫本系譜中刪除了屬入的寫本；¹⁴³ 這當然簡化了獲取原本的過程，不過也排除了反映文本傳播歷史真相的眾多線索。這種情況在生物學中變得十分有趣：表觀遺傳現象（epigenetic phenomena）在過去幾年越來越受討論；¹⁴⁴ 它們對應到語言學中外來詞彙的注入和寫本中的屬入現象，二者均代表已知譜系（如系譜 stemma，族譜 phylogram）的次要（常常也是膚淺）的變化。

一個相關的情況是巧合現象（coincidence），即兩個抄寫者在沒有相互影響的情況下犯了完全相同的錯誤。這可能源自發音習慣，比如拉丁文中的 | ae | 在某一地區的發音是 | e |，或者北印度方言中常常可以互換的 | ṣ | 和 | kh | 或是 | ṛ | 和 | ri |。不過後者在古吉拉特（Gujarat）和安塔拉（Andhra）的中間地帶則是 | ṛ | 和 | ru | 的互換。

其他錯誤源自古文書學：字母形狀近似（例如城體中的 | m | 和 | bh |，以及 | m | 和 | s | 的早期形式，或是南部的 | c | 和 | v |）。這些錯誤讓人們產生了這樣的錯覺：似乎這些寫本以某種方式相互關聯。為解決此一問題，研究後期笈多體（悉曇體，後期帕拉瓦體）和早期城體的古文書學勢在必行，因為我們的通識手冊止於西元一〇〇〇年。¹⁴⁵

最後，正如帕斯誇利（Pasquali）的理論（新寫本不等於壞寫本）表述的那樣，一些更晚的寫本也可能是非常古老的（通常更優秀的）寫本的抄本，例如在氣候適宜的地區（如尼泊爾、克什米爾）的寫本。或者，較晚的寫本通過選抄古寫本，可能保存了即使在現存最古老的寫本中也無法找到的初始元素。

這些情況可能會使寫本系譜複雜化。於是當屬入現象頻頻出現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這讓校勘者的工作舉步維艱（Schmidt 1988, Hanneder 2009-2010）。這一點很早就受到注意，並用做梵語史詩的法則；這就讓真正的精校本，例如笈多校本，不可能出現——正如《摩訶婆羅多》的校勘者蘇柯坦卡（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¹⁴⁶ 和敏柯夫斯基（Christopher Minkowski）¹⁴⁷ 強調的那樣。

¹⁴² 相關討論見 Pecchia in: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121-160.

¹⁴³ 關於拉赫曼（Lachmann）的方法如何被他的繼任者誤解，見 Schmidt 1988.

¹⁴⁴ 集中討論哪些基因被顯現（通過組織蛋白或是拉馬克方式），哪些未被顯現；解釋一個基因組（就像寫本原本）如何產生不同的結果（就像在實際的寫本中那樣）。雖然如此，「祖先」和大部分系譜都保持不變。

¹⁴⁵ 見哈雷—柏林計畫。

¹⁴⁶ Sukthankar 1933: lxxxii, lxxxvii；參見 Timpanaro 1971: 24 and Grünendahl 1993.

¹⁴⁷ 即將完成。

然而，也沒有必要絕望：由於印度書寫形式和方言發音的巨大差異，羈入現象常可輕易地追根溯源。比在古典的希臘羅馬傳統，學者可更容易地在梵文中找出乖離規範的地方。譬如吠陀中引用 J·跋吒 (Jayanta Bhaṭṭa) 《正理花鬘》(Nyāyamañjarī)¹⁴⁸ 的文字，在轉寫成城體的時候，由於克什米爾地區的梵文發音，產生了一些未被察覺的錯誤。在夏彌拉迦 (Syāmilaka) 《足撻》(Pādatāḍitaka) 的喀拉拉 (Kerala) 寫本中，也有類似的錯誤。¹⁴⁹ 中世紀《黑天戲牧女》(Gopālakelicandrikā) 中的轉寫錯誤顯示出從城體轉寫為格蘭塔字體 (Grantha)，然後又轉寫回標準城體的連續過程。¹⁵⁰ 因而，我不是個悲觀主義者——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很多¹⁵¹——就像是近年來僑尸迦 (Kāśikā) 版本¹⁵² 的討論或是漢內德 (Hanneder 2009-2010) 所主張的一樣。

§ 3.9. 傳統思潮

與羈入現象相仿的，是基本上未受注意的傳統傳播產生的影響。例如，在克什米爾和古吉拉特之間，¹⁵³ 以及古吉拉特和喀拉拉 (Kerala) 之間；比如在喀拉拉的寫本中發現克什米爾的異文；例子還包括從克什米爾到泰米爾納德 (Tamil Nadu)，以及從克什米爾到尼泊爾的傳播。¹⁵⁴ 在中世紀，巴依巴拉達《阿達婆吠陀》(Paippalāda Atharvaveda) 從古吉拉特傳到孟加拉/奧里薩，再傳至克什米爾，從而產生了富於區域影響的兩個亞原本系譜。¹⁵⁵ T·P·摩訶提般 (Thennila Puram Mahadevan 2011) 近期討論了北方《摩訶婆羅多》史詩傳統隨著兩支獨立的婆羅門遷徙傳入泰米爾納德和喀拉拉地區。也有反方向的傳播，例如《薄伽梵往世書》。¹⁵⁶ 為了更能把握這些傳

¹⁴⁸ 基本依據克什米爾寫本。見 Chowkhamba (1969-1971) 和 Mysore (1970) 的版本。

¹⁴⁹ 其馬拉雅拉姆寫本錯誤眾多，抄寫自克什米爾 (Śarādā) 寫本。見 de Vreese (1971) 關於 Schokker 版本 (1976) 的批評。

¹⁵⁰ 見 Kuiper (1987: 146) 的評論。

¹⁵¹ 見 Olivelle 2005；參見前文注釋。

¹⁵² 由 J. Bronkhorst 主持，Pascale Haag, et al. 見 Witzel：http://groups.yahoo.com/group/Indo-Eurasian_research/message/6244。又見 WZKS 52/53, 2009-2010。——其他關於羈入現象和不可能構建寫本系譜的論述包括：J. Hanneder, ed. of Abhinavagupta's *Mālinīśloka-vārttika 1*, 1-399, Groningen 1998: 40-45; H. Bakker, Skanda Purāṇa (Bakker et al. 1998: vol. I: 39), W. Callewaert (1996)，關於早期 NIA 宗教文獻及其與音樂的關聯；關於其他文獻學領域的舊觀點，見前文注釋；或是以意識形態為依據的觀點，例如 Cerquigliani (1999)，基於他的中世紀研究經驗。

¹⁵³ 克什米爾和古吉拉特的聯繫，由 Bühler (1877) 和 Knauer (1897) 指出。

¹⁵⁴ 後面兩個主要是濕婆教派 (Śaiva) 的文獻；既有實際寫本，也有寫本間的重合部分；見 Witzel 2001: *śaivācāryaḥ Kāśmiradesād āgataḥ*；此外還有中世紀尼泊爾碑銘和泰米爾納德碑銘中的證據。

¹⁵⁵ Witzel 1985b.

¹⁵⁶ 其他中世紀寫本流傳包括從西海岸到奧里薩，從北方邦和孟加拉到奧里薩，從北方邦到孟加拉，從泰米爾納德到喀拉拉，從印度北部各地到克什米爾 (1420-1470)，從泰米爾納德到克什米爾 (反之亦然)，還有從泰米爾納德到尼泊爾和瑞詩凱詩 (Rishikesh)；從貝拿勒斯到加德滿都河谷；較晚 (十八世紀) 的是從孟加拉到曼尼普爾 (Manipur)，從古吉拉特到馬拉塔 (Maratha) 和馬哈拉施特拉，從卡納塔克 (Gokarna) 到尼泊爾 (十七世紀)。

播途徑，學者應具有中世紀貿易路線的知識（貿易有助於寫本流傳），以及婆羅門學者活動區域的知識。婆羅門學者常常被中世紀的國王從雅利安邦（Āryāvarta）召喚而來，正如大量中世紀銅盤銘文中證實的那樣。¹⁵⁷

由於各色各樣的書寫形式和方言發音，文本在傳統思潮中的傳播難免產生許多抄寫錯誤。然而，作為結果的驛入現象卻常常可以輕易地判斷，如前所述，由於寫本的巨大差異，書寫形式截然不同，方言發音風格迥異：這些各不相同的寫本有助於追溯不同的傳播支流（以及可能的匯合處）。遺憾的是，這種探索幾乎無人問津。

§ 3.10. 「瓶頸」情況中的原本

即使存在這些複雜的情況，我希望通過親身經驗補充這一點：清晰建構原本的途徑並不缺乏；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可以建構出所有現存寫本所依歸的唯一中世紀原本。

例證包括：一部難以置信的吠陀文獻，即西元八〇〇年（Witzel 1985）的古吉拉特地區的巴依巴拉達版《阿達婆吠陀》，從這個版本演變出了奧里薩的當代誦本（recitation）；還包括基爾霍恩（Kielhorn）編輯的《大疏》（*Mahābhāṣya*），也是來自古吉拉特（Witzel 1986）；還有《摩奴法論》，包含第一千年後半期婆盧支的注釋，與其相對的是通行的北印度傳統，建立在西元一一六二年尼泊爾寫本的基礎之上。¹⁵⁸如前所述，¹⁵⁹這一情況可能與（寫本傳統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密切相關。¹⁶⁰

這些例證都源自前文（§ 1.1.）提及的瓶頸效應；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新的傳統潮流發展壯大，取代了其他潮流。¹⁶¹校勘一部特定的古典或中世紀文獻，迫切需要認真研讀衆多或全部寫本。然而印度學家們已經遠離校勘工作很久了，他們僅不斷地為熟知文本提供新翻譯。

¹⁵⁷ 詳見 Witzel 1986, 1994.

¹⁵⁸ Witzel 2001；其他早期尼泊爾《法論》寫本，例如西元一〇〇〇年的 *Yama Smṛti*，同樣代表了通行本，亟待研究。關於北部和南部《摩奴法論》的傳統，見 Olivelle 2005: introduction.

¹⁵⁹ Witzel, Presentation at the 14th World Sanskrit Conference, Kyoto Sept., 2009.

¹⁶⁰ 雖然有一些現存但通常難以獲得的錄音，我們無法證實這種與很多保存得更好的口述傳統相悖的情況。Staal 於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在喀拉拉的錄音藏於 UCLA；Guni Hesting Kirchheiner 於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在普納的錄音藏於哥本哈根的 State Library（價值 3,200 美元，見網址：<http://www.kb.dk/en/nb/samling/os/Sydasiens/veda.html>）；Shrikrishna Sharma 於上世紀七〇年代早期在 Tirupati 的錄音尚不可得。

¹⁶¹ 更早的傳統僅保存在喀拉拉、克什米爾和尼泊爾。

§ 4. 精校文本的形式

即使有（基於電腦的）寫本系譜協助，構建精校本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許多難題。這裡先講講精校本究竟應該以什麼形式展現。

§ 4.1. 異文 (variants)

例如這個古老的議題：將明顯的修正併入文本正文的做法是否正確。¹⁶² 正確的做法是，在校勘原始素材中準確列出各個寫本的全部異文。校勘者總是難以一以貫之地實施這一做法。全部異文，甚至是最常見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異文，都應被準確列出。這樣做僅僅是因為我們無法知道這些異文會將未來的學者指引向何處。¹⁶³

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拼寫」差異¹⁶⁴可能代表著地域特質和傳統（潮流）的發展。這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處理同構（homo-organic）鼻音¹⁶⁵時，常常由於偷懶而無區別地寫成一個點，Anusvāra (ṁ)¹⁶⁶。¹⁶⁷ 忽略了這個，我們就永遠不能知道這種做法在某些貴霜（Kuṣāṇa）時期的寫本中就已經出現，但通常不出現在晚近的吠陀寫本中。寫本中還經常「重疊」鼻音，也就是，既寫上了代表 Anusvāra 的點，也寫上了相應類別的鼻音。忽略了這個，我們就不清楚那些原本因為誤解了這一現象而產生的錯誤是如何產生的，來自寫本的哪一行，或是來自印度的哪個區域。這些細節在追溯闢入現象的源頭方面也十分重要；並可能說明一部沒有日期和版本的寫本的位置。其他的例子還更複雜。¹⁶⁸

§ 4.2. 正確的程序

只有在建構起寫本系譜，並且評估了各種證據之後，我們才可以進入更高級別的對於作者身份（例如 Śaṅkara 或是 Sāyaṇa 的注釋）¹⁶⁹、纂集（例如 Amaru 或是 Hāla 的詩）或是更為複雜的吟游詩人傳統（史詩）的校勘。豪斯曼說：「知識是好的，方

¹⁶² 參見 Olivelle 近期對奧義書版本的評論。

¹⁶³ 與之相似，Alsdorf (1950: 627) 受到 Olivelle 的批評；見 Hanneder and Maas 2009-2010。

¹⁶⁴ 注意 Einike 2009。

¹⁶⁵ 譯者注：同構鼻音（homo-organic nasal），即被後面的輔音同化的鼻音，例如 ṅ- 喉音，ñ- 顎音，ṇ- 頂音，n- 齒音，m- 唇音。

¹⁶⁶ Anusvāra（即符號“ṁ”的名稱）為梵文語法專有名詞，暫無對應漢譯，直譯為「隨聲」。所有同構鼻音都可以寫成 ṁ。寫本中則常常以字母上方加點的形式出現。

¹⁶⁷ 出現在大多數版本中；這一實踐在最早的梵文碑銘（西元一世紀）中就已經出現。

¹⁶⁸ 見 Witzel 1985a, b, 1986。

¹⁶⁹ Śaṅkara 是某些奧義書注釋（Mayeda 1967, Rau 1960）或 Bhavagovinda 的作者；關於 Pseudo-Sāyaṇa 作為吠陀注釋的作者，見 Slaje 2010；關於勝城注釋計畫（Vijayanagara commentary project）的背景知識，見 Galewicz 2009。

法是對的，然而最最重要的，是要有清醒的頭腦。」¹⁷⁰ 正如經驗告訴我們的那樣，有時用完了「書中所有伎倆」，即使是百裡挑一的校勘者也無法成功恢復殘缺的段落。¹⁷¹ 如前所述，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文中做上標記，然後原樣擺在那裡。僅僅是天分，或是，更糟糕的，想像力，是不管用的。應該有建立在寫本系譜方法之上的堅實證據，結合起歷史層面對於相關語言的全部認知，包括作者的個人風格，還要與平行文獻進行對比。平行文獻是再好不過的注釋了。

以吠陀文獻為例，合適的校勘程序包括睿智的決斷：吠陀寫本的傳播品質並不總是盡如人意。特別是文獻的流傳範圍僅限於印度的一個地區¹⁷²時，就更容易出錯。在這些地理上受到局限的案例中，必須——

- 嚴格確定案例中吠陀學派和相關寫本的地理傳播範圍；
- 列出該學派的讀音和書寫特質，尤其是體現地域古文書學特色的部分；
- 確定寫本系譜，盡可能向上追溯，並且試圖找到該傳統的原本；
- 評估次要證據（語法和哲學注釋）；
- 將結果與預期的「正常吠陀」（normal Vedic）比對。所謂「正常吠陀」，即使在吠陀時期也具有地域特色。¹⁷³ 只有到這個時候，才能思考這個文本在寫本、口述傳統以及吠陀文獻語音學（Prātiśākhya）的傳播中有多少與原本相一致，距離編輯的版本或是撰寫時的最初狀態到底多遠。這一工作尚未系統地開展。這樣的原則必須適用在所有適用（mutatis mutandis）的梵語文獻上。

這牽連到印度文獻學的諸多領域：如果我們擁有以下條件，我們可以在追溯特定文獻的形態和歷史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進步：

（1）適當的版本，最好包括寫本系譜，或者至少包含了校勘者可以獲得的全部寫本的異文。¹⁷⁴

（2）對於各種後笈多時期悉曇體，早期城體，以及地域性後期南帕拉瓦印度字體的古文書學知識，最好一直延伸到西元一六〇〇年；¹⁷⁵ 雖然從西元九世紀到十一世紀前後的寫本數量有限；不過犍陀羅語寫本（大多用從非婆羅謎字體

¹⁷⁰ Housman 1921: 84.

¹⁷¹ 見前文注釋，關於巴依巴拉達《阿達婆吠陀本集》的修訂。

¹⁷² 例如：Śaunaka 和 Paippalāda Atharvaveda, Maitrāyaṇi, Kaṭha 和 Kapiṣṭhala Saṃhitā, Jaiminīya Brāhmaṇa, Vādhūla 文本。

¹⁷³ Witzel 1989.

¹⁷⁴ Vishva Bandhu (1963)/Kaul (1967)/Kölver (1971) 為這一情形提供了範例。

¹⁷⁵ 見前文注釋；關於哈雷—柏林的成果，見網址：<http://www.indologie.uni-halle.de/forschung/indoscript.htm>；關於中亞寫本，見 Sander 1968.

〔non-Brahmī〕發展而來的驢唇體〔Karoṣṭhī，佉盧文〕寫成）是個例外。新疆的佛教殘卷，數量眾多的尼泊爾早期寫本，¹⁷⁶以及古吉拉特出土的少量耆那教古寫本，也是例外。其他證據來自碑銘——碑銘的字體往往比寫本更為保守。

（3）更多關於特定方言發音習慣的知識，最好從吠陀和其他經典誦讀，以及中世紀碑銘的證據中收集而來。方言發音是造成抄寫錯誤的常見原因。最終，我們需要繪製一個「語音」和手稿錯誤的歷史地圖。這將有助於追溯一部特定文獻的傳播歷史。這些正是我很久之前就提出的設想。¹⁷⁷一些柏林和哈雷（Halle）的學者正努力在網上製作各種歷史字母表。¹⁷⁸

總之，我認為當代印度學家尚未窮盡校勘（精校）的方法（包括新近「生物學」系譜的方法），而且離想像的地步還很遠。

§ 4.3. 證據

如果寫本系譜研究方法的批評者們依然不肯相信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好的版本，¹⁷⁹即使這個版本僅依賴於一個寫本，我主張我們「進入吠陀思維」，並且從內部開始辨析，循著吠陀作者的思維軌跡。我僅以自己的親身經驗為例：我在一九七二年校勘了《羯陀森林書》（*Kaṭha Āraṇyaka*）的開頭五行。從照片（Witzel 1974, 2004）可以看出，這份獨一無二的古寫本破碎不堪。我不得不依賴於缺失字母的數目，上半截字母或是下半截字母的痕跡，並且，十分重要的是，依賴斷斷續續的重音符號作為覆核的標準。在微縮膠片上，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憑藉上述技術性的資料（利用檢視的方法），試圖恢復古寫本的原貌。

此外，我研究了殘片中各種相近的詞組和幾個保留下來的關鍵詞。恢復工作遵循著文獻的形式：「必然性」（Zwangsläufigkeit）的梵書形式。在開頭，半截句子被重複，不過用的是一種被後人稍事修改的形態。然而，如何能確定呢？幸運的是，段落中還包含另一條線索，即常見的「思維—語言—行動」（*manas - vāc - karman*）概念。¹⁸⁰因此，我完全確信我正確地恢復了文本原貌（通過高級校勘即精校）。

¹⁷⁶ 也是從貝拿勒斯及周邊地區輸入的，不過保存在尼泊爾（和西藏地區）。

¹⁷⁷ 關於巴依巴拉達傳統，1985；關於《大疏》（*Mahābhāṣya*），1986。

¹⁷⁸ 參見網址：<http://userpage.fu-berlin.de/~falk/index.htm>；關於中亞和東亞的傳統悉曇體，參見網址：<http://www.omniglot.com/writing/siddham.htm>；關於中亞書寫形式，參見 L. Sander (1968)。

¹⁷⁹ 一個相關例證是 Hoffmann (1975) 對巴依巴拉達《阿達婆吠陀本集》的改動，得到了 K. C. Acharya 寫本 (1971) 的證實，而這在很久之後才為人所知 (Hoffmann 1992)。

¹⁸⁰ 這種詞語搭配不僅見於吠陀，還出現在緊密相關的伊朗文獻（*manah- vacas - šiiioθna*, Yasna 34.1-2）和基督教文獻之中。見 Jean Haudry 的論述，*La Triade pensée, parole, action, dans la tradition indo-européenne* (Milano: Archè, 2009)。

最後，當我回到杜賓根大學圖書館（Tübingen University Library），重新核對最初的寫本，我發現原來開頭的空白部分是因為微縮膠片被一片小小的樺樹皮擋住了。當我取出這片錯位的樺樹皮，我發現了寫本的原貌，跟我恢復的一模一樣。

如果我們可以寫吠陀梵語寫得那麼好，那麼我們當然也可以校勘、翻譯和理解它們。¹⁸¹

後記：本篇譯文經過與維茨爾教授多次討論，又得到黃柏棋教授和張谷銘教授的熱情幫助。特此感謝！

（2012.5.4 ~ 2014.6.15 定稿）

¹⁸¹ 見 Witzel 1997.

參考文獻

- * Acharya, K. C. 1971. "Linguistic Remarks on Some Words in the First Kāṇḍa of the Paippalādasamhitā of the Atharvaveda." In *Proceedings of the All India Congress of Linguistics*, 96-99.
- * Aklujkar, Ashok. 2008. "Patañjali's Mahābhāṣya as a Key to Happy Kashmir." In *Linguistic Traditions of Kashmir*, edited by Ashok Aklujkar, Kapila Vatsyayan, and Mrinal Kaul. New Delhi: D. K. Printworld.
- * Allon, M. and R. Salomon. 2010. "New Evidence for Mahāyāna in Early Gandhāra." *Eastern Buddhist* 41: 1-22.
- * Alsdorf, L. 1950. "Contributions to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Kaṭhōpaniṣad." *ZDMG* 100: 621-637.
-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 Bakker, H.T., R. Adriaansen and H. Isaacson. 1998-2004. *The Skandapurāṇa, critically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English synopsis*, vol. I. Groningen: E. Forsten, 39.
- * Barbrook, A. C. et al. 1998. "The phylogeny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Nature* 394: 839.
- * Bédier, J. 1928. "La tradition manuscrite du Lai de l'ombre. Réflexions sur l'art d'éditer les anciens textes." *Romania* 54: 161-196, 321-356.
- * Berry, Joel M. *Orientalism and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http://www.asiaticsociety.org.bd/journals/vol%2052/ORIENTALISM%20AND%20THE%20ASIATIC%20SOCIETY%20OF%20BENGAL.html>.
- * Betz, Hans Dieter. 1985. *The Greek Magical Papyri in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Bhattacharya, Dipak. *The Paippalāda-Samhitā of the Atharvaveda: critically edited from palmleaf manuscripts in the Oriya script discovered by Durgamohan Bhattacharyya and one Śāradā manuscript*. Vol. I, Consisting of the first fifteen Kāṇḍas.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1997. Vol. II, Consisting of the Sixteenth Kāṇḍa. Calcutta: The Asiatic Society 2008. — Durgāmohana Bhaṭṭācārya. *Atharvavedīyā Paippalādasamhitā: upodhātēna yathāpekṣitaṭippanyaḍibhiśca sametā*. Kalikātānagarī: Saṃskṛta Kalej 1964-1970.
- * Boehtlingk, Otto. 1889. *Bṛhadāraṇjakopanishad in der Mādharmaḍdina-Recensio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ä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 ———. 1889. *Khāndogjopanishad*. Leipzig: H. Haessel.

- * Bordalejo, B. 2003. *The phylogeny of the tale-order in the Canterbury Tales*. PhD thesis, New York University.
- * Boulton, James T. 199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xt-Editing: Essays in Honour of James T. Boulton*, edited by Ian Small and Marcus Wal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Bühler, Georg. 1877. *Detailed report of a tour in Kashmir, Rajputana, and Central India, Bombay*.
- * Callewaert, W. 1996. "Translating Santa Literature (North India, 1400-1700 A.D.)." In *Translating, Translations, Translators: From India to the West*, edited by E. Garzilli, 1-10. Cambridg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Opera Minora.
- * Cerquigliani, Bernard. 1999. *In praise of the variant: a critical history of philology*. Baltimore.
- * Colas, Gérard and Gerdi Gerschheimer. 2009. *Écrire et transmettre en Inde classiqu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 * Collin, H. S. and C. J. Schlyter. 1827. *Corpus iuris Sueo-Gotorum antiqui. Samling af Sweriges gamla lagar*. Stockholm: Z. Haeggström.
- * Colwell, E. C. 1947. "Genealogical Method: 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Limitation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 109-133.
- * Dearing, Vinton A. 1969a. "Review: Machine-Assisted Textual Criticism."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4.2: 149-154.
- * Dearing, Vinton A. 1969b. *A Manual of Textual Analysis*. Los Angel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Derrett, J. Duncan M. 1964. "Bhārucci on the Royal Regulative Power in Ind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4: 392-395.
- * ———. 1975. *Bhārucci's commentary on the Manusmṛiti (The Manu-Śāstra-Vivarāṇa, books 6-12)*. Wiesbaden: Steiner.
- * Deshpande, Madhav M. 1997. *Śaunakīyā Caturādhyāyikā: a Prātiśākhya of the Śaunakīya Atharvaveda, with commentaries Caturādhyāyībhāṣya, Bhārgava-Bhāskara-Ṫrtti and Pañcasandhi critically edited, translated & annotated*. Cambridg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52.
- * Dharmadhikari, T. N. et al. 1990. *Vedic texts: A Revision*. Delhi.
- * Dirks, N. 1996. "Introduction." I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by Bernard S. Cohn. Princeton.
- * Einike, Katrin. 2009. *Korrektur, Differenzierung und Abkürzung in indischen Inschriften und Handschrift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 * Falk, H., "Another collection of Karoṣṭhī manuscripts from Gandhāra." XVth Congress of the *Intl. Assoc. of Buddh. Studies*. Atlanta: an Avadāna MS, carbon (C14) dated to 184-46 BCE.
- * Faulhaber, Charles B. 1991.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Romance Philology* 45: 123-148.
- * Fix, Hans. 1984. "Production and Usage of a Machine-Readable Manuscript: A Report on the Saarbrücken Version of Gragas Konungsbok." In *Computer Applications to Medieval Studies*, edited by Anne Gilmour-Bryson, 107-116. Kalamazoo.
- * Froger, J. 1968. *La critique des textes et son automatisaton*. Initiation aux nouveautés de la science 7, Paris.
- * Galewicz, Cezary. 2009. *A commentator in service of the Empire. Sāyaṇa and the royal project of commenting on the whole of the Veda*. Wien.
- * Geldner, Karl F. 1886-1896. *Avesta,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Parsis, publish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Stuttgart: Kohlhammer.
- * Ghosh, Atharvaṇá. 2002.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Atharva Ved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ts Paippalāda tradition*. Kolkata: Sanskrit Book Depot.
- * Gode, P. K. 1954. "Bernier and Kavīndrācarya Sarasvatī at the Mughal Court." In vol. 2 of *Studies in Indian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P. K. Gode, 364-379. Bombay: Singhi Jain Sāstra Śikshāpīth.
- * ———. 1969. "Some evidence about the location of the manuscript library of Kavīndrācarya Sarasvatī." In vol. 3 of *Studies in Indian Literary History*, edited by P. K. Gode, 71-76. Poona: Collected Works Publication Committee.
- * Gonda, Jan. 1935. *The Javanese Version of the Bhagavadgītā*. Batavia: Koninklijke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der Konsten en Wetenschappen.
- * Gray, Russell D. and Quentin D. Atkinson. 2003. "Language-tree divergence times support the Anatolian theory of Indo-European origin." *Nature* 426 (27 November 2003): 435-439. doi:10.1038/nature02029
- * Greetham, D. C. 1992. "Textual Scholarship." In *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edited by Joseph Gibaldi, 103-137. New York: MLA.
- * ———. 1994. *Textual scholarship: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Garland.
- * Greg, W. W. 1927. *The Calculus of Varian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 1927, 1935. *The play of Antichrist, from the Chester cyc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 1950-1951. "The Rationale of Copy-Text."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3: 19-36.

- * Griffiths, Arlo. 2009. *The Paippalādasamhitā of the Atharvaveda, Kāṇḍas 6 and 7: a new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Groningen Oriental Studies, vol. 22. Groningen: E. Forsten.
- * Grünendahl, Reinhold. 1993. “Zur Klassifizierung von Māhābhārata- Handschriften.” In *Studien zur Ind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edited by G. Grünendahl et al, 101-130. Bonn: Indica et Tibetica.
- * ———. 2009-2010. “Post-philological gestures - ‘deconstructing’ textual criticism.” *WZKS* 52/53: 17-28.
- * Hanneder, Jürgen. 1998. *Abhinavagupta’s philosophy of revelation: an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Mālinīśloklavārttika I*, 1-399. Groningen: Forsten.
- * ———. 2011. “Zum Verhältnis von Wortlaut und Interpretation.” *ZDMG* 161: 98-113.
- * Hanneder, Jürgen and Philipp A. Maas. 2009-2010. “Text Genealogy,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Technique.” *WZKS* 52/53: 1- 306.
- * Haudry, Jean. 2009. *La Triade pensée, parole, action, dans la tradition indo-européenne*. Milano: Archè.
- * Hoffmann, Karl. 1975-1976.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edited by J. Narten, vols.1-2. Wiesbaden: Reichert.
- * ———. 1992. “Textkritisches zur Paippalāda-Samhitā.” In vol. 3 of *Aufsätze zur Indoiranistik*, edited by S. Glauch, R. Plath and S. Ziegler, 819-823. Wiesbaden: Reichert.
- * Housman, A. E. 1961. “The application of thought to textual criticism. Proceedings of the Classical Association 18, 1921.” In *Selected Prose*, edited by John Car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Ikari, Y. 1996. “Vādhūla Śrautasūtra I.1-4 (Agyādheya, Punarādheya), A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Vādhūla Śrautasūtra, I.” *Zinbun (Journal of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30: 1-129.
- * Jayanta Bhaṭṭa. 1969-1971. *Nyāyamañjarī: Gautamasūtratātparyavivṛtiḥ/Sūryanārāyaṇasūklah. Varānasī : Caukhambā Saṃskṛta Sīrjā Āfisa.*
- * Ježić, Mislav. 1986. “Textual Layers of the Bhagavadgītā as Traces of Indian Cultural History.” In *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s Alten Orients* 18, 628-63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 * ———. 2005. “Can a Monkey Play a Bitch? Hanumant and Saramā.” In *Epics, Khilas and Purāṇa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Dubrovni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anskrit Epics and Purāṇas*, edited by Petteri Koskikallio, 255-293. Zagreb: Hrvatska akademija znanosti i umjetnosti.

- * Katre, Sumitra Mangesh. 1954. *Introduction to Indian textual criticism*.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 * Kaul, Srikanth. 1967. *Rājatarāṅgiṇī of Jonarāja. Edited with text comparative and critical annotations and an elaborate introduction*. Hoshiarpur: Vishveshvaranand Vedic Research Institute.
- * Kenney, E. J. 1974. *The Classical Tex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Kielhorn, F. 1880-1885. *The Vyākaraṇa-mahābhāṣya of Patanjali*. Bombay: Government Central Book Depôt.
- * Knauer, Friedrich. 1897. *Das Mānava-grhya-sūtra*. St. Petersburg: J. Glasounof, M. Eggers & cie.
- * Kölver, Bernhard. 1971. *Textkritische und phil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Rājatarāṅgiṇī des Kalhaṇa*. Wiesbaden: F. Steiner.
- * Kuiper, F. B. J. 1987. *Gopālaketikāndrikā*. Amsterdam/New York: North-Holland Pub. Co.
- * Lachmann, Karl. 1816. *Über die ursprüngliche Gestalt des Gedichtes von der Nibelungen Noth*. Berlin: Dümmler.
- * Lariviere R. 1989. *The Nārada-smṛti, criticall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notated translation, and appendices by Richard W. Lariviere*. Philadelphia: Dept. of South Asia Reg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 Lichayev, D. S. 1971. "Grundprinzipien textologischer Untersuchungen der altrussischen Literaturdenkmäler." In *Texte und Varianten*, edited by G. Marten, and H. Zeller, 301-315. München: C.H. Beck.
- * Limaye, V. P. and R. D. Vadekar. 1958. *Eighteen Principal Upaniṣads*. Poona.
- * Lopez, Carlos A. 2010. *Atharvaveda-Paippalāda. Kāṇḍas Thirteen and Fourteen. Text, translation, commentary*.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Opera Minora 6. Cambridge.
- * Lubin, Timothy. 2007. "The Nīlarudropāṇiṣad and the Paippalādasamhitā: A Critical Edition with Translation of the Upaniṣad and Nārāyaṇa's Dīpikā." In *The Atharvaveda and its Paippalādaśākhā*, by Griffith, Arlo and Annette Schmiedchen, 81-140. Aachen: Shaker Verlag.
- * Lubotsky, Alexander. 2002. *Atharvaveda-Paippalāda. Kāṇḍa Five. Text, translation. Commentary*.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Opera Minora 4. Cambridge.
- * Maas, Paul. 1968 [1922]. *Textual Criticism*. Oxford.
- * ———. 1949.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s.v. Textual Criticism.
- * Maas, Philipp A. 2006. *Samādhipāda: das erste Kapitel des Pātāñjalayogaśāstra zum ersten Mal kritisch ediert.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Pātāñjalayogaśāstra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ly edited*. Aachen: Shaker.

- * Mahadevan, T. P. 2011. "The Ṛṣi index of the Vedic Anukramaṇī system and the Pravara lists: Towards a Pre-history of the Brahmins." *EJVS* 18.2: 1-139.
(<http://ejvs.laurasianacademy.com>)
- * Mallinson, J. 2007. *The Khēcarīvidyā of Ādinātha: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an early text of haṭhayoga*.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 Marín, Francisco Marcos. 1991. "Computers and Text Editing." *Romance Philology* 45: 102-122.
- * Maue, Dieter. 1976. *Bṛhadāraṇyakopaniṣad*. Giessen.
- * Mayeda, S. 1965.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hagavadgītābhāṣya ascribed to Śaṅkara."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 und Ostasiens* 9: 155-197.
- * ———. 1967. "On Śaṅkara's Authorship of the Kenopaniṣadbhāṣya." *Indo-Iranian Journal* 10: 33-55.
- * Müller, F. M. 1849-1874, 1890-1892. *Rig-Veda-Sanhita, the sacred hymns of the Brahmins: together with the commentary of Sayanacharya*. (6 vols.) London: W.H. Allen.
- * Nīlakaṇṭha. 1888-. *Mahābhārata with Nīlakaṇṭha's commentary*, edited by Kṛṣṇa Śāstrī Gurjar. Bombay: Jagadīśvara Press.
- * O'Hara, R. J. and P. M. W. Robinson. 1993. "Computer-assisted methods of stemmatic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s (Canterbury Tales Project)* 1: 53-74.
- * Olivelle, Patrick. 1998. "Unfaithful Transmitters. Philological Criticism and Critical Editions of the Upaniṣads."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6: 173-187.
- * ———. 2005. *Manu's code of law: a critical edi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Mānava-Dharmaśāst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 2009. *The law code of Viṣṇu: a critical edition and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Vaiṣṇava-Dharmaśāstra*. Cambridg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73.
- * Oort, Marianne. 2002. "Surā in the Paippalāda Samhitā of the Atharvaveda." *JAOS* 122: 355-360.
- * Pandit, Shankar Pāndurang. 1895-1898. *Atharvaveda with the commentary Sāyaṇācārya*. Bombay.
- * Pollock, Sheldon. 2007. "Literary culture and manuscript culture in precolonial India." In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material book*, edited by Simon Eliot, et. al, 77-9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 Quentin, Henri. 1922/1926 *Mémoire sur l'établissement du texte de la Vulgate*. Rome: Desclée et cie.
- * Rau, Wilhelm. 1960. "Bemerkungen zu Śaṅkaras Bṛhadāraṇyakōpaniṣadbhāṣya." *Paideuma* 7: 293-299.

- * Ringe, Donald A. 1992. *On calculating the factor of chance in language comparison*.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 * Robinson, P. M. W. and R. J. O'Hara. 1992. "Report on the Textual Criticism Challenge 1991."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3.4: 331-337.
(<http://bmcr.brynmawr.edu/1992/03.03.29.html>)
- * ———. 1996. "Cladistic analysis of an Old Norse manuscript tradition." *Research in Humanities Computing* 4: 115-137.
- * Roth, Gustav. 2005. *Bhiksuni-vinaya including Bhiksuni-prakiranaka and a summary of the Bhiksu-prakirnaka of the Arya-mahasamghika lokottaravadin*. Patna.
- * Roth, Rudolf und W. D. Whitney. 1856. *Atharva Veda Sanhita*. Berlin: Dümmler.
- * Salomon, Richard. 1991.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Praśna Upaniṣad." *WZKSA* 35: 47-74.
- * ———. 1998. *Indian epigraphy: 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in Sanskrit, Prakrit, and the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Sander, Lore. 1968 *Paläographisches zu den Sanskrithandschriften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Wiesbaden: F. Steiner.
- * Sarma, K. V. 2007. "The manuscript collection of the Jaḍe family of Varanasi and the literary output of the Jaḍe authors." In *New Lights on Manuscriptology*, edited by Prof. Siniruddha Dash, 69-79. Chennai: Sree Sarada Education Society.
[Includes: Scribes in Indian tradition: 110-123; Problems of editing ancient texts: 184-192; Critical text-editing in ancient India: 194-209; Variant readings and text reconstruction in Indian manuscriptology: 210-222;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India: 1-17].
- * Sarma, Sreeramamula Rajeswara. 1985. *Writing materials in Ancient India*. Aligarh: Viveka Publications.
- * Sastry, R. Anantakrishna. 1921. *Kavīndrācārya-Sūcīpatram*. Baroda: Gaekwad Oriental Series 17.
- * Scharpé, A. 1954-. *Kālidāsa-lexicon*. Brugge: De Tempel.
- * Schmidt, P. L. 1988. "Lachmann's method: On the history of a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Uses of Greek and Latin: Historical Essays*, edited by A. C. Dionisotti, A. Grafton and J. Kraye, 227-236. London: The Warburg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 * Schokker, Gérard H. 1966, 1976. *The Pādatāḍitaka of Śyāmilaka*. A text-critical edition. The Hague, Paris, Mouton & Co.
- * Schwob, Anton et al. 1989. *Historische Edition und Computer. Möglichkeiten und Probleme interdisziplinärer Textverarbeitung und Textbearbeitung*. Graz.

- * ———. 1992. *Méthodologies informatiques et nouveaux horizons dans les recherches médiévales: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aint-Paul-de-Vence, 3-5 septembre 1990*.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 * Singh, A. K. 1991. *Development of Nāgarī Script*. Delhi: Parimal Publications.
- * Slaje, Walter. 2010. “Syaṇa oder Mādhava?: Verfässherschaft und Reihenfolge der Samhitā-Kommentare aus Vijayanagara.”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ZDMG)* 160.2: 383-414.
- * Small, Ian and M. Walsh. 199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xt-Ed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Smart, Barry. 1997. *Critical assessments*. London.
- * Staal, J. F. 1961. *Nambudiri Veda Recitation*. ‘s Gravenhage.
- * ———. 1986. *The Fidelity of oral tradi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cience*.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 Stein, Marc Aurel. 1900. *Kalhaṇa’s Rājatarāṅgiṇī*. Westminster: A. Constable.
- * Sukthankar, V. S. 1933-1966. *The Mahābhārata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ly Edited*. Poona: Bhandarkar Oriental Institute.
- * Tanselle, G. Thomas. 1989. *A Rationale of Textual Critic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 Thorpe, James. 1972. *Principles of Textual Criticism*. 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 * Timpanaro, Sebastiano. 1971. *Die Entstehung der Lachmannschen Methode*. Hamburg. [1985. *La genesis del metodo del Lachmann*. Padua; 2005. *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Yunesuko Higashi Ajia Bunka Kenkyū Sentā (Tokyo, Japan). [Toyo Bunko] “List of Microfilms Deposited in the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10, March 1971: 53-85; March 1973: 1-40, 73-105.
- * Upodhyaya, Kunja Bihari. 2010. *Atharvanaveda Paippalada Samhita*. Puri: Nijīya Prakāśanam.
- * Vishva Bandhu. 1963. *Rājatarāṅgiṇī*. Hoshiarpur: Vishveshvaranand Vedic Research Institute.
- * Vreese, K. de. 1971. “Review of: G. Schokker, *The Pādatāḍitaka of Śyāmilaka*. The Hague 1966-76.” *Indo-Iranian Journal (IJ)* 13: 44-47.
- * Weitzman M. 1987. “The evolution of manuscript tradition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150: 287-308.

- * West, Martin Litchfield. 1973. *Textual criticism and editorial technique applicable to Greek and Latin texts*. Stuttgart: Teubner.
- * Wezler, Albrecht and Shujun Motegi. 1998. *Yuktidīpikā: the most significant commentary on the Sāṃkhyakārikā*. Stuttgart: F. Steiner.
- * Whitney, W. D. 1881. "Index verborum to the published text of the Atharva Veda." *JAOS* 12: 1-383.
- * ———. 1890. "Böhtlingk's Upanishad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11: 407-439. (<http://www.jstor.org/stable/288195?seq=5>)
- * ———. 1893. "The Native Commentary to the Atharvaveda." In *Festgruss an Rudolf von Roth zum Doktor-Jubiläum, 24. August 1893*. von seinen Freunden und Schülern, 89-96. Stuttgart: Kohlhammer.
- * ———. 1905. *Atharva-Veda-Saṃhitā*.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Cambridge, Mass.
- * Wilamowitz-Moellendorff, U. von. 1927/1959. *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 Leipzig: Teubner.
- * Windram, H. F. et al. 2008. "Dante's Monarchia as a test case for the use of phylogenetic methods in stemmatic analysis."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3: 443-463.
- * Witzel, Michael. 1974. *Das Kāṭha Āraṇyaka*. [Teildruck]. Kathmandu/Erlangen.
- * ———. 1977. "An unknown Upaniṣad of the Kṛṣṇa Yajurveda: The Kāṭha-Śikṣā-Upaniṣad." *Journal of the Nepal Research Centre* 1: 139-155. Wiesbaden-Kathmandu.
- * ———. 1979, 1980. "Die Kāṭha-Śikṣā-Upaniṣad und ihr Verhältnis zur Kṛṣṇavalli der Taittirīya-Upaniṣad." *WZKS* 23: 5-28, *WZKS* 24: 21-82.
- * ———. 1985a. "Die mündliche Tradition der Paippalādins von Orissa." *MSS* 44, 1985a: 259-287.
- * ———. 1985b. "Die Atharvavedatradition und die Paippalāda-Saṃhitā." *ZDMG*, Supplementband VI. Stuttgart 1985b: 256-271.
- * ———. 1986. "On the Archetype of Patanjali's Mahābhāṣya." *IJJ* 29: 249-259.
- * ———. 1989. "Tracing the Vedic Dialects." In *Dialectes dans les littératures Indo-Aryennes*, edited by C. Caillat. Paris.
- * ———. 1994. "Kashmiri manuscripts and pronunciation." In *Studies on the Nīlamata-Purāṇa*, edited by Y. Ikari, 1-53. Kyoto.
- * ———. 1997. *Introduction to: Inside the Texts - Beyond the Texts*. Cambridge: HOS-Opera Minora 2.
- * ———. 2001. "Medieval Veda Tradition as Reflected in Nepalese Manuscripts." *Journal of the Nepal Research Centre* 12: 255-299.

- * ———. 2004. *Kaṭha Āraṇyaka. Critical edition with a translation into German and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65.
- * ———. 2009. “Variant Readings in the Ṛgveda?” Presentation at the 14th World Sanskrit Conference, Kyoto, September.
- * Zehnder, Thomas. 1999. *Atharvaveda-Paippalāda Buch 2, Text, Übersetzung, Kommentar: eine Sammlung altindischer Zaubersprüche vom Beginn des 1. Jahrtausends v. Chr.* Idstein: Schulz-Kirchner Verlag.

編後語

本期《古今論衡》由四篇論文組成。王金潮與王瑋合著的《實驗考古》一文，透過實驗復原中國青銅的鑄造方式，欲證明中國青銅時代不存在失蠟法，且當今存世的所有中國青銅時代的青銅器，皆為泥範法鑄造。我們期待這篇大膽而有趣的文章，可以引起更多後續的討論。

曹德啓討論北周「文王碑」與唐叱干公「三教碑」在形制上與位置上的相鄰，推論叱干公挪用「文王碑」中的武將形象，攀附北周之世系，以形塑自己龍驤將軍的英勇。文中推論或仍可商榷，然可備一說，以俟來者。

洪金富的〈校定本《元典章》序〉討論了《元典章》一書的內容與價值、版本、語言與文字、編輯、校勘上的問題。《元典章》乃法律史中的重要文獻，由於牽涉到蒙古統治所用的語言、翻譯和族群等問題，一向號稱難讀。相信本校定本出版後，當對學界有重要的貢獻。邁克爾·維茨爾教授（Prof. Michael Witzel）的論文，以印度學為例，介紹了西方的考證方法（尤其是對文本的復原與校勘），並討論了電腦科技，對於文本考據的影響。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維茨爾教授之論文正可供吾人理解和比較中國考證學與西方 philology 之間的異同。也希望能由此引發不同文化，不同時代，處理文本的方式的討論。總之，本期論文，實驗性質多，所見或可爭論，但若能引發更多的學術討論，那本刊的任務便已達成。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主編
祝平一

編輯委員
林聖智 陳昭容 陳雯怡 郭素秋

編輯助理
黎瑞春 陳淑梅 丁瑞茂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二十六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ISSN 1561-0594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六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 180 元

翻印須徵得本刊同意

美術構成：黎瑞春

封面設計：魏吉玉

印刷者：惠文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商：四分溪書坊

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五楠圖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本刊已加入「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聯合百科電子資料庫——PDF 全文檢索定位系統」、「TAO：Taiwan Academic Online 臺灣學術線上」。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no. 26

June 2014

Contents

Essays

WANG Jinchao and WANG Wei

A Case of Experimental Archaeology: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ollowed-out Bronzes in Clay Mould Casting Technique

TSAO De-qi

Replic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Paradigm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ele of King Wen of North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Stele of the Ritual Place for the Three Teachings from the Tang Dynasty

HUNG Chin-fu

Preface to the Punctuation Edition of the *Yuan Dianzhang* (*Compendium of Statutes of the Yuan Dynasty*)

Research Notes

Michael Witzel, ZHANG Yuan (trans.)

Philolog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dology

From the Editorial Board

Institute of History &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ISSN 1561-0594

